

### 第三章 果戈理與《狄康卡近鄉夜話》

在理論和研究上使文學與心理學直接聯繫起來的是佛洛伊德(S.Freud)，其著作《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1900)深刻地論述詩人的夢幻與他實際創作活動間的密切關係。<sup>79</sup>作家往往經由創作塑造出一個小世界，藉以使其慾望獲得片刻的放縱，精神免於崩潰和得到治療。他將情感和精力灌注於作品的世界當中，暫時解脫現實而進入忘我之境。<sup>80</sup>對於初來乍到首都彼得堡的果戈理，也有著同樣的心理歷程：他認為自己一天中最美好的時刻是同他創作的人物相聚在一起。他身在寒冷而陰沈的彼得堡，卻陶醉於展現陽光燦爛下的烏克蘭富饒土地、懶洋洋的農民和喜劇演員。<sup>81</sup>到了夜晚寫作的時間，果戈理沈浸在他一手創造的《夜話》世界裡，使他可以暫時擺脫彼得堡惱人的天候與單調煩厭的公務。

也許是果戈理的宿命，他始終無法擺脫「謎」樣的人物形象，俄國哲學家別爾加耶夫(Н. А. Бердяев)更是稱呼果戈理為「俄國文學中最謎樣的人物」。<sup>82</sup>而心理學研究法可就作家、作品與讀者這三方面來進行研究，因此探索作家心理成了分析作品的前提。在作家心理這方面，主要是探究作家生平與文學上的聯繫，作家和作品間的關係，從心理學角度揭露創作過程的奧秘。可以通過作家傳記的探討，研究作家閱讀過的書目，生平中的某些事件，對他們產生影響的一切，而這些又是怎樣轉向藝術的意識？如何虛構想像，如何運用技巧？通過追溯資料的來源和作品創作過程的心理分析，探討作家的思想、觀念、情緒、動機，從而瞭解其創作衝動，這些資料是如何被融化進作家的創作意識中。<sup>83</sup>因此第一節的果戈理素描，將從心理途徑切入，回溯果戈理早期生平（至1835年），並檢視形成他對於魔鬼（惡）的觀念以及狂歡化性格意念的事件，因為這兩種特性明顯地呈現在《狄康卡近鄉夜話》這部作品中，透過作家創作心理層面的剖析，將

<sup>79</sup> 劉介民，《比較文學方法論》，頁193。

<sup>80</sup> 同上，頁194。

<sup>81</sup> 亨利·特羅亞著，趙惠民譯，《幽默大師果戈理》，頁110-111。

<sup>82</sup> М. Д. Аксёнова глав. ред.,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для детей: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От былин и летописей до классики XIX века, т. 9, с. 491.

<sup>83</sup> 劉介民，《比較文學方法論》，頁194。

使我們能對作品有更深入的體會。

此外，藉由歷史途徑檢視作者的書信、手札，從中汲取與《狄康卡近鄉夜話》這部作品相關的史料，進行歷史拼湊，可以還原作品的發展脈絡。而相關的傳記與書信，更有助於瞭解果戈理創作構思的內情和友人交往對話的實況。

## 第一節 果戈理素描（1809-1835）

### 壹、果戈理與其內心的魔鬼

#### 一、家庭背景

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果戈理(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1809-1852)於一八〇九年三月二十日(新曆四月一日)出生在小俄羅斯<sup>84</sup>的正中心，波爾塔瓦省(Полта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米爾戈羅德縣(Миргородский уезд)大索羅慶采村(Великие Сорочинцы)。果戈理-揚諾夫斯基(Гоголи-Яновские)家族是擁有一千俄畝<sup>85</sup>土地與四百個農奴的典型地主家庭。作家的童年便是在雙親的領地瓦西里耶夫卡(Васильевка)<sup>86</sup>度過的。這塊領地也就位在米爾戈羅德縣的傳奇狄康卡(Диканька)旁。果戈理使「狄康卡」這個地名在自己的首部成名作中永垂不朽。

當時信仰東正教的烏克蘭，依然保留有多神教儀典的殘餘。在這裡，一切都混雜在一起，既信仰基督，也有表演淫穢場面的古老宗教木偶戲巡迴演出；既恪守齋戒，也有市集上無拘無束的尋歡作樂、豐美的食物與鮮豔的服飾。而果戈理誕生的地方，是邊界，是接合處，是緩衝地帶，也是交叉路口。這塊土地曾多次易手。這裡血統混雜，方言混雜，信仰也混雜；果戈理的祖先們，時而倒向華沙，時而倒向莫斯科。就從他的複姓果戈理-揚諾夫斯基(Гоголь-Яновский)也可以感覺出這種混雜的跡象。“果戈理”

---

<sup>84</sup> 當時如此稱呼烏克蘭。

<sup>85</sup> 一俄畝等於二千四百平方俄丈或一·〇九公頃。

<sup>86</sup> 又名揚諾夫希納(Яновщина)。

原本是對鳥、公鴨或花花公子的一種戲稱。哥薩克人的名字就是從這種外號演化而來的。“揚諾夫斯基”則帶有波蘭情調。<sup>87</sup>果戈理的祖先是波蘭貴族，曾在 17 世紀時效忠波蘭而獲得爵位，其祖先葉夫斯塔菲·果戈理(Евстафий Гоголь)<sup>88</sup>即是一位深受波蘭國王寵信的上校，戰功彪炳，而果戈理-揚諾夫斯基這個家族，就是由他傳下來的。

果戈理的祖父阿法納西·杰米揚諾維奇(Афанасий Демьянович Гоголь-Яновский)曾在波爾塔瓦修道院和基輔神學院求學，但後來並沒有克紹父職成爲神父。據說阿法納西精通希臘語、波蘭語、拉丁語和德語，正是這樣的才華使其受聘爲果戈理祖母的家庭教師，兩人進而發展出感情。結婚成家後，就在瓦西里耶夫卡田莊定居。他會說不少引人入勝的故事，而且他每次都會給這些故事增添一些新的細節，有時這些故事甚至變得和原先毫無相似之處，裡面的人物和環境都變得沒法辨認了。<sup>89</sup>果戈理祖父的這項特質不禁令我們聯想到《伊凡·庫巴拉節前夜》(«Вечер накануне Ивана Купала»)中的敘述者福馬·格里戈里耶維奇(Фома Григорьевич)，兩者宛如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福馬·格里戈里耶維奇養成了一種特殊的怪癖：他最不喜歡重複所講過的同樣的話了。有時候，你要是請他把故事再講一遍，那你瞧吧，他一定會添枝加葉糅進許多新的內容，或者完全改頭換面，叫你聽不出是同一個故事。(頁 43)

祖母塔季雅娜·塞米奧諾夫娜<sup>90</sup>(Татьяна Семёновна)。她出身於歷史悠久而體面的哥薩克家庭，瓦西里耶夫卡領地是她的嫁妝。她喜歡向孫子講述過去輝煌的年代，那時“查波羅什”(запорожцы)哥薩克人組成了名爲“謝奇”(сечь)的獨立團體，他們選舉了自己的首領並抵抗波蘭，而關於哥薩克的書寫日後更是頻繁地出現在果戈理《狄康卡近鄉夜話》、《塔拉斯·布爾巴》(«Тарас Бурьба»)等作品當中。此外，祖母還知道很多民歌和民間的恐怖神話，小時候的果戈理情不自禁地愛聽這些神秘、恐怖的故事。

<sup>87</sup> 伊·佐洛圖斯基著，劉倫振等譯，《果戈理傳》，頁 6。

<sup>88</sup> 又名奧斯塔普(Остап)。

<sup>89</sup> 伊·佐洛圖斯基著，劉倫振等譯，《果戈理傳》，頁 9-10。

<sup>90</sup> 娘家姓里佐古布(Лизогуб)。

父親瓦西里·阿法納西耶維奇(Василий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Гоголь, 1777-1825)酷愛文學，懂拉丁文，看了很多書，善於講故事。他擅長寫作，寫過詩歌，還編過一齣描寫輕浮浪蕩貴族的喜劇。然而，他的真正才能表現在用烏克蘭語編寫而成的民間喜劇，這些喜劇使人感到一種無拘無束的歡樂和滑稽的嘲諷，富有農民的生活氣息，雖然全部只有一齣保存下來，但卻為果戈理狄康卡故事中《索羅慶采市集》和《五月之夜》兩篇故事提供了題詞的來源。父親具有那種引人入勝地講故事的天賦，只要他這人能想到的，他就能以天生的小俄羅斯式的滑稽幽默，添油加醋地講述他的故事。<sup>91</sup>他是個天性浪漫，內心深處充滿幻想的人，這樣的特質多少也為果戈理所繼承，而他最感興趣的事莫過於在大自然的懷抱中，領略寧靜的鄉間生活情趣。

母親瑪麗亞·伊凡諾夫娜<sup>92</sup>(Мария Ивановна, 1791-1868)，從小是由姑姑安娜(Анна)所帶大的。瑪麗亞對兒子的宗教教育極為關心，她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女性，很早就帶著兒子上教堂。起初，小尼古拉對教堂沒有任何好感，甚至感到厭煩，他像其他人一樣畫十字，但漫不經心。有一次心血來潮，小尼古拉要求母親解釋「最後審判」的含義，母親便為他描繪了一幅天堂和地獄的景象，使得小尼古拉明瞭善人將得到幸福，而罪孽深重之人將遭受懲罰的道理。自從聽了這個故事之後，小尼古拉每個星期日都抱著崇敬和恐懼的雙重心情去教堂做禮拜。

果戈理父親和母親的婚事則是充滿了傳奇性。在果戈理父親十四歲時，他就已經知道自己未來的妻子是誰。當他與父母一同去朝聖的途中在客店過夜時，夢到聖母出現在其面前，指著一個裹著白衣的嬰兒說：「這是你的未婚妻。」而當他們驅車駛過科夏羅夫斯基的田莊亞列西卡(Яреська)時，瓦西里認定瑪麗亞·科夏羅夫斯卡亞就是那個嬰兒。此後瑪麗亞整個童年時期便備受瓦西里的關注，他羞怯然而不懈地追求她，直到瑪麗亞成長為十四歲的少女時，瓦西里便向她求婚。婚後兩人便回到瓦西里耶夫卡過著寧靜幸福的生活。

---

<sup>91</sup> 維·魏列薩耶夫著，周啓超、吳曉都譯，《生活中的果戈理》，頁 10。

<sup>92</sup> 娘家姓科夏羅夫斯卡亞(Косяровская)。

在生下果戈理之前，瑪麗亞已有兩次流產經歷，因此對這新生命的到來顯得戰戰兢兢，爲了擺脫厄運，夫婦倆決定如果生下一個兒子將取名爲尼古拉，以表示對聖徒尼古拉的崇敬。果戈理生下來便是個瘦弱多病的孩子，因此母親對他格外關心。

當果戈理和弟弟妹妹長大些時，便從鄰村雇來一名叫雅吉姆(Яким)的小伙子來照顧他們。他心地善良，可頭腦遲鈍，嘴饞貪吃。他知道許多關於秘密寶藏和妖魔鬼怪的嚇人故事，據他說，他奶奶同這些妖魔鬼怪還是遠房親戚。小果戈理從亞吉姆那裡獲知不少關於女巫的故事。

不論是果戈理的家人或是僕人幾乎都很擅長說故事，尤其是嚇人的恐怖民間故事，果戈理可謂是自小耳濡目染，童年時就已埋下對民間口頭創作喜愛與嚮往的種子，日後更是以此爲素材創作出不朽的作品《狄康卡近鄉夜話》。

此外，不得不提及果戈理家一位顯赫的權貴親戚和「恩人」，住在基賓茨(Кибинцы)的德米特里·普羅科菲耶維奇·特羅辛斯基(Дмитрий Прокофьевич Трошинский)。他是果戈理母親的遠房親戚<sup>93</sup>，曾先後擔任過葉卡捷琳娜二世(凱薩琳大帝)、保羅一世、亞歷山大一世三位沙皇的廷臣，退休後安居到自己的家鄉基賓茨。在這裡經常舉行盛大的宴會，還演出各種節目，家中經常賓客雲集，果戈理一家便時常被邀請到他家作客，在基賓茨有一座劇院，果戈理的父親也會爲演出寫一些喜劇，他和果戈理母親兩人也常在這裡的舞台上演出。果戈理在這兒看盡上流社會的人生百態，狂飲作樂、逢迎諂媚、高貴者對卑微者的羞辱等等，都在小小年紀的果戈理心中烙印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特羅辛斯基那裡的場景也必定激發了果戈理小時候豐富的想像力。此外到特羅辛斯基家的大圖書館裡來看書，是果戈理小時候最爲滿足的一件事。特羅辛斯基家裡收藏了不少圖書，可以想見果戈理透過這豐富的藏書，開拓了寬廣的文學視野，不僅是烏克蘭作家的作品，更是得以一窺俄羅斯及西方作家的作品。夏皮洛(Gavriel Shapiro)

---

<sup>93</sup> 特羅辛斯基的兄弟安德列·普羅科菲耶維奇(Андрей Прокофьевич)娶了瑪麗亞·伊凡諾夫娜的親姑姑安娜·馬特韋耶夫娜·科夏羅夫斯卡亞(Анна Матвеевна Косярская)。

在提出果戈理與巴洛克文化遺產之間有所聯繫的理論時，就推測果戈理對巴洛克的認識有來自於環境的因素，而其中之一便是特羅辛斯基豐富的圖書館藏。<sup>94</sup>

## 二、童年時期

在《狄康卡近鄉夜話》裡可以明顯感覺到種種猖獗的不潔之力的神話角色，往往這些不潔之力也就是邪惡力量的代表，在果戈理這部早期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果戈理與邪惡力量鬥爭的努力。果戈理的童年是其抵抗邪惡力量立場塑形的一段相當重要的時期，下面就回溯一些發生在果戈理童年時影響其形成對「惡」具敏銳感受的事件。

根據果戈理的好友斯米爾諾娃(А. О. Смирнова, 1809-1882)回憶，果戈理曾告訴她一件孩提時期的插曲。在果戈理五歲時，有一個夜晚，其父母外出，僕人們一一入睡，妹妹們也個自回房就寢，僅留下他一人孤零地坐在客廳裡，沮喪地望向漆黑的窗外，四周一片靜寂，這詭異的沉寂，先是觸及他敏銳的聽覺，爾後，又潛進他的意識，使他不由得感到恐懼。忽然間，掛鐘鳴響了起來。果戈理告訴斯米爾諾娃，在那時，他覺得鐘擺的敲擊聲就是時間向永恆逝去的咚咚聲。就在當時，一隻貓突然發出微弱清晰的喵喵聲，邊叫邊向他撲來…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忘記貓兒伸著懶腰的走路姿勢，那柔軟的四足不時地用爪子輕敲地板，一對綠眼閃耀著不祥的邪光…他頓時感到內心的顫抖，在沙發上瑟縮著身子面向牆壁。最後他鼓起勇氣，趁勢一把抓起貓兒，跑向花園並將牠丟進池塘，貓兒並沒有立刻淹死，還繼續掙扎向岸游動，一直喵喵慘叫，最後果戈理抓起一根棍子，又把貓從岸邊推開，貓咪的叫聲就此停息，池水將牠淹沒。此時的果戈理思緒翻騰，雖感害怕，卻又同時產生一種復仇的快感，雖報復了貓咪所引起的恐懼，但內疚之心也油然而生。果戈理回憶說：「他覺得他淹死的是一個人。他開始憐惜那隻貓，憐惜自己，於是哭了起來。直到他父母返家，父親知曉此事後，狠狠地打了他一頓，體罰的疼痛才將他從無盡的歇斯底里狀態中解救出來。」<sup>95</sup>果戈理認為，他所領悟到的不是身體的傷疼，而是他確實經

<sup>94</sup> Gavriel Shapiro, Nikolai Gogol and the Baroque Cultural Heritage, pp. 13-14.

<sup>95</sup> 伊·佐洛圖斯基著，劉倫振等譯，《果戈理傳》，頁 38。

歷了心靈的痛楚。

一雙綠眼閃耀著不祥之光的貓咪，無疑地對還是五歲男孩的果戈理造成極大的威脅，貓彷彿就是魔鬼的化身，一步一步地向其進逼，闖進了小男孩警戒守衛的「安全範圍」，逾越了小男孩認知設定的、免受外在邪惡勢力入侵的警戒線。所以當貓挑戰此一臨界，小男孩便直覺必要消滅這股惡勢力，<sup>96</sup>雖然事後他也懊悔內疚，但這種愧疚乃是出於謀殺生命的不該，對消滅「不潔之力」的想法則始終義無反顧，其不願向惡勢力妥協的決心也可見一般。這件事是果戈理與魔鬼間的第一次相遇、第一場戰鬥，是果戈理一生精神世界善惡衝突的濫觴，更是果戈理日後眾多藝術創作的原型。<sup>97</sup>

此外，按普特尼(Christopher Putney)的看法，發生在果戈理十歲以前最重大的一件事，便是弟弟伊凡(Иван)突然在 1819 年暑假生病去世，這件事對小小年紀的果戈理產生很大的衝擊，因為弟弟只小他一歲，兩人感情很好，兩兄弟在 1818-1819 年一起進入波爾塔瓦縣立學校(Полтавское уездное училище)就讀，平常兩人就是形影不離。而母親從小灌輸給果戈理的宗教教育，更加深了他對死亡的畏懼。可以想像「死亡」侵犯了小果戈理所建立起的「安全區域」，激發小男孩對惡靈的恐懼以及地獄等待罪人的那幅可怕場景的想像。果戈理悲痛逾恆，父母親為了使他從喪弟的悲痛中走出，便將他送到涅仁高級中學(Нежинская гимназия высших наук)就讀，使他遠離那傷心的環境。而伊凡之死給幼小的果戈理帶來的另一項衝擊，便是加深了果戈理的孤立和孤獨感。

### 三、涅仁中學時期

果戈理在 1821 至 1828 年就讀涅仁高級中學。這所學校的寄宿生大都是名門子弟，在「恩人」特羅辛斯基幫忙下，果戈理順利地被編入二年級就讀。在這環境裡，來自鄉村的果戈理跟其他的同學顯得格格不入，身體

---

<sup>96</sup> Christopher Putney, Russian Devils and Diabolic Conditionality in Nikolai Gogol's Evenings on a Farm near Dikanka, pp. 74-75.

<sup>97</sup> Ibid., p. 74.

瘦弱、無精打采的樣子引來同學們對他的嘲笑，如此一來，他更感孤獨。同學們給他取了個「神秘的矮人」(таинственный карло)的綽號，這是史考特(Вальтер Скотт)的小說《黑矮人》(чёрный карлик)裡一個主角的名字。<sup>98</sup>簡言之，小男孩相當害羞且自尊心很強，偏好作弄同學，發覺他們滑稽的特徵，很會「猜人心思」，但是自己本身的計畫、內心的願望卻不輕易地告訴任何人；儘管他深沈，不輕信他人，然而對自己的好友卻願意暢敘胸懷。在中學時期，果戈理的課業表現並不理想，然而日後成為傑出的諷刺作家似乎在此時已顯露了些許端倪。喜愛惡作劇的果戈理，其作弄的對象不限於自己的同學，甚至是老師也都難逃被果戈理惡整的命運。他喜歡裝出滑稽的樣子來模仿老師和同學，或是給同學亂取綽號。

在涅仁時期，果戈理更是培養了他寫作與戲劇的興趣。果戈理曾扮演《紈袴少年》(«Недоросль»)裡的普羅斯塔科娃(Простакова)，予人難以磨滅的印象。一般而言，他喜歡扮演老頭和老太婆之類滑稽可笑的角色。此外，他也展開了自己的寫作生涯，和一些朋友共組文學社團，從 1825 年起出版有插圖的《北方黎明》(«Северная заря»)月刊，包括他們自己創作的小說和批評。而創作《狄康卡近鄉夜話》最重要的資料來源《萬有文庫或常用百科全書》(«Книга всякой всячины, или подруч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也是果戈理從 1826 年還在涅仁時期就開始編輯的，裡頭抄錄了各式各樣的資料，包括烏克蘭習俗、語言和文學，以及從各種不同來源抄下來的段落，或是由各種不同主題所編輯而成的資訊，如俄國習俗、歐洲的植物生長、園藝學、歷史、藝術和建築等。

在中學裡，同學們共同出資建立了自己的圖書館。果戈理被選為圖書管理員，他做了一些指套，發給讀者使用，以便使書籍的壽命更長一些。然而，這樣的作法與果戈理本人邋邋的外表是相矛盾的。根據他一位涅仁同學阿爾替諾夫(Н. Ю. Артынов)的說法，沒有人敬重這位圖書館員的「乾淨法規」，況且這不過是為那奇怪、不整潔的小男孩再添一樁可供取笑的事蹟罷了。然而這種過度吹毛求疵的行為、對污穢的恐懼，似乎和年輕果戈

---

<sup>98</sup> М. Д. Аксёнова глав. ред.,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для детей: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От былин и летописей до классики XIX века, т. 9, с. 491.



理保護潔淨事物免受不潔事物沾污的需求一致。<sup>99</sup>

#### 四、女人中的魔鬼

果戈理一生未婚，而義大利作家蘭多菲(Tommaso Landolfi, 1908-1979)卻寫了篇名為《果戈理之妻》(«Gogol's Wife»)的短篇故事，單是標題就十分引人側目，而內容不免有些許戲謔的意味。故事的敘事者是果戈理的朋友兼傳記作者，他「很不願意地」告訴我們有關果戈理妻子的故事。蘭多菲筆下的果戈理娶了一個充氣娃娃，可隨心所欲改變形狀與大小，果戈理愛上這個妻子，樂於和她行房，給她取名為「卡拉卡斯」(Caracas)。頭幾年諸事平順，但是果戈理染上梅毒之後，便開始無理取鬧，把錯都怪到充氣娃娃妻子身上。而妻子的沈默不語，更是使果戈理愛恨交纏，他懷疑妻子紅杏出牆，所以才這麼冷漠，一心轉向宗教。最後，果戈理氣得不斷給她充氣，讓她爆成碎片。這位大作家撿起亡妻的殘骸，放進爐火燒掉，落得和他手稿一樣的下場。講完了這個悲劇，敘事者為果戈理虐妻一事辯護，並向果戈理這位超凡的天才致敬。<sup>100</sup>

這樣的作品姑且不論是否有污衊果戈理這位偉大作家之嫌，可是卻不得不讚歎蘭多菲創意十足，因為果戈理後來著迷於宗教，也曾多次焚燬自己的手稿，富於創意的幻想為果戈理添了一位「妻子」，再巧妙地結合史實細節，造就出這篇有趣、又具些許戲謔意味的小故事。

的確，果戈理對女人的態度搖擺於兩個極端之間：或則加以美化，崇奉為神，或則冷眼相對，譏之為「愛情事務」。<sup>101</sup>藉這小故事切入果戈理如何看待女人的這個主題。在 1831 年文學報(«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上刊登一篇非常不尋常的作品，一段名為《女人》(«Женщина»)的偽柏拉圖對話。果戈理第一次以他自己的名字發表。文章包含了柏拉圖和他虛構的弟子泰勒克勒斯(Телеклес)之間的對話，泰勒克勒斯責備他的老師誤導他說

---

<sup>99</sup> Christopher Putney, Russian Devils and Diabolic Conditionality in Nikolai Gogol's Evenings on a Farm near Dikanka, p. 87.

<sup>100</sup> 哈洛·卜倫(Harold Bloom),《盡得其妙—如何讀西方正典》(How to Read and Why)。台北：時報，2002，頁 56-57。

<sup>101</sup> 伊·佐洛圖斯基著，劉倫振等譯，《果戈理傳》，頁 184。

女人是最高理想、神聖的、美好的創造物，因而男人應該學會在精神上去愛她們。泰勒克勒斯的信仰在發現他的情人阿爾基諾婭(Алкиноя)不忠之後便破滅了。他認為以柏拉圖的聖明睿智要去認識女人，就如同無底深淵的險惡人心尚嫌幼稚，然後發出一深沈的嘆息，成爲一種單獨痛苦的呻吟，包含著靈魂的永恆折磨。

傷心、憤怒的泰勒克勒斯在向其老師抱怨時，對女人做了這樣的非難：

製造出了多麼可怕的東西！奧林波斯山上的宙斯！啊，你發起怒來是勸不住的！你降禍給人間，你把無聲無息地滲透在你那美妙的大地地心深處的禍害全都吸引出來，壓縮成一滴水珠，用你的賜予光明的手憤怒地拋了出去，讓它去毒害你那些奇妙的傑作：你竟然製造了女人啊！你開始嫉妒我們這麼一點可憐的幸福了，你不願意人們從善良的內心裡永久不息地湧出感恩的話語，寧願聽他們有罪的舌尖上吐出詛咒… 你竟然製造了女人！<sup>102</sup>

雖然針對這一點柏拉圖並沒有爲阿爾基諾婭多做辯護，反而是大體上爲所有女人展開了浮誇的辯護。但就如此多的女人在果戈理的小說中扮演魔鬼般的角色來看，泰勒克勒斯將女人視爲「地獄般的產物」比起柏拉圖那套女人是愛、美和理想的言論，更爲接近作者自己的想法。<sup>103</sup>

我們不難發現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女人的類型就是十分兩極化。一是青春美好的十七、八歲少女形象，這類型或許反映出了果戈理心目中完美女性的典型。而另一方面，卻可以感覺到果戈理對女性的極度貶抑，例如在《索羅慶采市集》中，契列維克(Черевик)正爲自己找到一個好女婿而喜不自禁，卻被他那怒氣沖沖的妻子潑了冷水，於是眼看好好的一个小伙子，就這麼吹了。隨後契列維克更發出一段不平之鳴：「老天爺呀！爲什麼要這樣責罰我們這些罪人呢？世界上已經有那麼多廢物了，你幹嘛還要造一些女人！」(頁 20)言下之意，女人和廢物無異。在《五月之夜》裡，

<sup>102</sup> 尼·果戈理著，劉季星譯，《果戈理散文選》，頁 3。

<sup>103</sup> Christopher Putney, Russian Devils and Diabolic Conditionality in Nikolai Gogol's Evenings on a Farm near Dikanka, p. 104.

甘娜(Ганна)要求列夫科(Левко)說出關於湖邊那棟房子的可怕故事時，列夫科因擔心甘娜會害怕而睡不著覺加以婉拒，然而拗不過甘娜的請求，列夫科說了這樣的話：「看來，人們說得對。鬼一旦附在姑娘們的身上，就會挑起她們的好奇心。」(頁 66)除了可以感覺到果戈理對女性的這種好奇心很不以為然外，更直接地表明魔鬼與女性的聯繫。

1832 年 12 月果戈理寫給達尼列夫斯基(А. С. Данилевский)的信裡，在回應達尼列夫斯基與其分享他正沈浸在戀愛的喜悅當中這事時，果戈理寫道：「你的心境我至為理解，深表同感，雖然多虧命運，我本人未能體驗。所以我說：多虧！不然，這火焰會在瞬息間把我化為灰燼，我會忘懷於一閃而過的享受，我會竭力使這種享受化為真實，並使自身成為這種努力的犧牲，所以，我的得救在於我有堅毅的意志…」。<sup>104</sup>此處果戈理所運用「多虧命運」、「得救」的措辭，再次證明了果戈理看待女人的態度，慶幸自己沒有和「魔鬼」有所牽扯。普特尼認為果戈理無意識地將獻身女人明白地聯想為獻身魔鬼，而「火焰會在瞬息間把我化為灰燼」這個景象，以果戈理對民間信仰及聖徒傳文學的熟悉程度，「自燃」在裡頭所代表的正是不幸和魔鬼有所牽涉的致命下場。

將女人視為危險的生物，更進而發展為果戈理對婚姻的排斥與恐懼。因為果戈理所認為的幸福結局時常和西方戲劇或小說裡以婚姻作為幸福結局的概念相左。果戈理作品裡的幸福結局往往是男主角逃脫即將發生的婚姻束縛。如科瓦廖夫(Ковалёв)少校在《鼻子》(«Нос»)結尾時，成功地逃離了婚姻的陷阱；在《婚事》(«Женитьба»)一劇中的波德科列辛(Подколесин)，必須從二樓的窗戶跳下實現類似的逃脫計畫；《欽差大臣》(«Ревизор»)裡的赫列斯塔科夫(Хлестаков)和《死靈魂》(«Мёртвые души»)裡的齊齊科夫(Чичиков)在他們是騙子這件事將要被揭發之際，不詳的婚姻主題此時便被提出，用以警告這些知名人士如果他們再繼續待在他們拜訪的城鎮將是十分冒險，因而加速了他們的逃逸。<sup>105</sup>這諸多例子在卡林斯基(Simon Karlinsky)看來並非巧合。再審視《狄康卡近鄉夜話》這部作品中唯一有形的妖魔鬼怪銷聲匿跡的故事——《伊凡·費多羅維奇·希邦卡和他

<sup>104</sup> 伊·佐洛圖斯基著，劉倫振等譯，《果戈理傳》，頁 190。

<sup>105</sup> Simon Karlinsky, The Sexual Labyrinth of Nikolai Gogol, p. 36.

的姨媽》(«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Шпонька и его тётушка»)裡，早已屆適婚年齡的希邦卡對待結婚抱持極大的懷疑態度：結婚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要結婚？似乎作者和自己的主角一同發問。故事中希邦卡對婚禮、妻子的恐懼也呼應了這個看法。

此外，卡林斯基更舉證當果戈理對於妹妹們長大後找到未婚夫時的負面反應，即使他對妹妹們的情況所知有限且尚未見過妹夫，他也通常會要求母親再重新考慮，不要同意婚事，如果可能的話就取消婚約。

卡林斯基在探討果戈理的性別之謎時，做了如下的結論：既然他所認識的同齡男人都對女人有興趣，且都結婚去了，而果戈理既不要女人也不要結婚，他將女人、愛情、婚姻再現描寫為危險和可怕的，可能是他將自己為何對其他人所渴望認為的正常世界缺乏興趣合理化的方法。<sup>106</sup>可以確定的是在果戈理潛意識中存在著排斥女性的一面，故進而加以醜化，這樣的邏輯不難解釋何以在果戈理觀點裡，女人身上總是存在著某些魔性事物，或者甚至直接將女人看做是魔鬼的化身。

## 五、孤立和說謊

雖然果戈理在中學時培養了戲劇和寫作的興趣，可是他的孤獨感與孤立感似乎也在這個時期更為加深。儘管有少數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巴濟利(К. М. Базили)、達尼列夫斯基 (А. С. Данилевский)和庫科利尼克(Н. В. Кукольник)等和他一同分享對戲劇的熱情，但他依然覺得相當孤獨。他覺得即使在這圈子裡也沒有一個人和他有真正的共同點。他傾向對他人隱藏自己真正的情感以保護自己，即使是在聽聞父親死訊時，果戈理最先注意到的還是對他人隱藏自己的反應。<sup>107</sup>他在1825年4月23日寫給母親的信中提到：「請別擔心，最親愛的媽媽！我以一個真正的基督徒的堅毅承受了這一打擊。真的，起初我是被這個噩耗震昏了；但我沒讓任何人看出我很悲傷。當我孤身獨處時，我就沈入瘋狂的絕望之中。」<sup>108</sup>喪親之痛一如此

<sup>106</sup> Simon Karlinsky, The Sexual Labyrinth of Nikolai Gogol, p. 37.

<sup>107</sup> Christopher Putney, Russian Devils and Diabolic Conditionality in Nikolai Gogol's Evenings on a Farm near Dikanka, p. 88.

<sup>108</sup> 維·魏列薩耶夫著，周啓超、吳曉都譯，《生活中的果戈理》，頁24。

巨大的悲痛，果戈理在初聞這個噩耗時竟然還能克制自己的悲傷，極力對外人隱藏，唯有到獨處的時候，他才讓自己真正的情感宣洩出來，這種異於常人的反應，在普特尼的解釋下是一種自我保護。

他在 1828 年 3 月 1 日畢業前幾個月寫給母親的信中說道：「我經受的痛苦和窮困，比您想像的要多。我在家的時候，我之所以總是在您面前盡量做出漫不經心、任性的樣子，是希望您以為我很少受到磨難，很少受到惡的壓抑。然而未必有誰曾忍受過如此之多的忘恩負義、愚蠢而又可笑的滿懷野心的不公平對待、冷若冰霜的輕蔑等等。我忍受一切，不責怪任何人，沒有任何牢騷，任何人都不曾聽到我的怨言，我甚至總是向那些給我造成痛苦的人說好話。人們把我看成是個謎，任何人都無法完全猜透我。」<sup>109</sup>果戈理自身承受的痛苦甚至在最親近的親人面前都無法表露，無法活出真實的自我，也難怪他內心孤獨感會日益加深；信中更是可以看出果戈理似乎不時都會受到「惡」的磨難，在年紀尚輕之際，他就有和惡交鋒的豐富經驗，難怪在日後作品中他戮力貶抑、摧毀這頑強的敵人。他連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需不斷地演戲，儘量不讓別人猜透他的心思，可以想見這種性格為他帶來多大的煎熬。

這樣的性格漸漸導致他甚至寧願孤獨地處在豬群中而不願處在人群中。他似乎成了一個厭惡與人交往的人，他在自己的四周築起了一道牆，循著一條心理界線(чур)保護他自己避免被他人所污染。<sup>110</sup>總而言之，這個時期果戈理的性格是多變、古怪的。然而自我加諸的孤立感非常濃厚，而且似乎隨著他年紀增長而更加深刻。果戈理日益顯示出自己是一個根本上與眾不同的個體，即使在生理結構上也與眾不同，因此為他孤立的狀態提供了理由。亞濟科夫(Н. М. Языков)在 1841 年寫給他弟弟的信中說道：「果戈理對我述說了他自己身上的(很有可能是臆想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病狀，以及身上一切可能有的疾病胚胎。他還講到，他的大腦有著特殊的結構，他的胃的位置是不自然的。在巴黎，好像有一些名醫給他診察過，那些醫生認為，他的胃的位置是顛倒了。…」<sup>111</sup>然而，按照果戈理不按牌理出牌

<sup>109</sup> 果戈理著，李毓榛譯，《果戈理書信集》，頁 31。

<sup>110</sup> Christopher Putney, Russian Devils and Diabolic Conditionality in Nikolai Gogol's Evenings on a Farm near Dikanka, p. 88.

<sup>111</sup> 維·魏列薩耶夫著，周啓超、吳曉都譯，《生活中的果戈理》，頁 146。

的個性，這件事的可信度令人存疑，但如果這件事是真的，他還真的是與他人截然不同。

果戈理另一個壞毛病就是他的說謊傾向。成年的果戈理最親近的友人之一阿克薩科夫(С. Т. Аксаков)指出撒謊是果戈理最大的特性，果戈理似乎「捏造出所有的廢話以便隱藏事實」。<sup>112</sup>靠著說謊，即使是毫無意義的廢話，果戈理覺得他得以掌控那個會使他屈服而說出事實的環境。按照普特尼的看法，這似乎是年輕的果戈理對於自身本質必定不能顯露出來，否則便會受到侵犯的想法之持續，而這種種的事例也呼應了他的安全區域絕不容逾越的信念。果戈理從早年似乎就進入一種情緒放逐，顯然是受到要保護自己免受敵對元素侵害的驅使。甚至果戈理在開始出版他的作品時，依然是隱匿在化名之後，又是一個例證。

## 六、前往首都

1828年6月果戈理從涅仁中學畢業，六個月後，因多年來夢想在彼得堡謀一政府公職而前往首都。在隆冬他和朋友達尼涅夫斯基一起前往彼得堡，抵達時他患了重感冒，迫不得已在家中歇息好些天。無疑的，首都給果戈理的第一印象也因此蒙上一層陰影。整體而言，果戈理對他長久夢想的都市彼得堡感到失望。他在抵達後於1829年1月3日寫給他母親的第一封信裡，除了向母親抱怨彼得堡的高物價外，同時也提到這個城市的硬體面使他感到氣餒：「…我覺得彼得堡完全不是我想像的那樣，在我想像中它可要美麗的多、宏偉的多。」<sup>113</sup>果戈理強烈感到，在這個沒有生氣、缺乏靈魂的城市裡住著一群空洞的人，因此果戈理在1834年12月14日寫給波戈金(М. П. Погодин)的信中埋怨，在大學裡講課得不到學生的反應：「…哪怕有一個大學生能理解我也好呀！這是一群沒有色彩的人，就像彼得堡一樣。」<sup>114</sup>

1829年7月初，果戈理認為彼得堡的一切都不如他所預期：非但沒在

---

<sup>112</sup> Christopher Putney, Russian Devils and Diabolic Conditionality in Nikolai Gogol's Evenings on a Farm near Dikanka, p. 90.

<sup>113</sup> 維·魏列薩耶夫著，周啓超、吳曉都譯，《生活中的果戈理》，頁33。

<sup>114</sup> 同上，頁74。

政府擔任一個出色的公職，而且還被迫做一個他所憎恨的低級公務員；而城市本身也不是他所期待的那個華麗首都。最糟的是果戈理首次用自己的錢，在五月出版的文學嘗試《漢斯·古謝加頓》(«Ганц Кюхельгартен»)顯然失敗，因此就在這段期間果戈理萌生到國外走走的計畫。

## 七、《漢斯·古謝加頓》的失敗

《漢斯·古謝加頓》是一首田園詩，敘述一個在平靜鄉村長大，卻嚮往過一種不同凡響生活的德國人漢斯的故事，他離開了景色如田園詩般的河谷和心愛的人到希臘和更遠的地方進行兩年的朝聖之旅。這個青年企望看到奇妙的國度和不尋常的人，希望體驗崇高的感情，經歷意外的奇遇。然而他所追求的那個美好世界卻使他大失所望。最終這個浪漫的徒步旅行者在旅行結束後，回到家中和他心愛的人團聚，在平和的鄉村生活中，找到他小小的幸福人生。這個漢斯在某種程度上，彷彿就是果戈理自身的投射。一直嚮往彼得堡生活的果戈理，在來到首都後，卻產生了對周遭現實不滿的失落感。其實漢斯所反映出來的這種不安定的精神狀態，模模糊糊的願望，對於遙遠的地方、對於某種莫名其妙的東西的探索和嚮往、對於簡單現實的不滿等，這些精神上的不安和憂鬱症的顯現，正是果戈理本身早期的感受。<sup>115</sup>普特尼再次將漢斯最終回到家鄉，歸因於家鄉可以保護他遠離邪惡充斥的外在世界。

然而果戈理害怕《漢斯·古謝加頓》遭受非難的結果還是成真。原本事情可能還更糟，所幸果戈理是以筆名出版的。即使在他最親近的朋友之間，他也會儘量避免和他們討論他的文學創作。至於《漢斯·古謝加頓》的下場是果戈理和他的僕人瘋狂地將每一本他們所能找到的書買回來，果戈理就在他的公寓裡將它們全部燒毀。

## 八、出走國外

在燒書事件後，果戈理寫信告知母親他即將出國這件事。在這封信

---

<sup>115</sup> 赫拉普欽科(М. Б. Храпченко)著，劉逢祺等譯，《尼古拉·果戈理》(«Николай Гоголь: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уть, величие писателя»)，頁 90。

中，果戈理說自己旅行的緣由是對某位不知名女性的火熱激情，果戈理編了這個謊言來解釋他遠行的原因，但不論是達尼列夫斯基，還是其他同學們都不曾在果戈理身上看出浪漫激情的任何痕跡和一般道德操行上的變化。<sup>116</sup>他撒謊說他愛上一個天仙般的女子，可是她拋棄了他，因此他必須逃離這個地方，他需要尋找孤獨，果戈理將其解釋為神為他安排的部分計畫，是神意指示他必須遠離俄國、長途跋涉，並進行隱居生活。這種遠走他地以沈澱心情的需求，這些尋找孤獨和在國外隱居自己的言語，再次道出他必須在自身周圍築起一道保護牆，保護他免受那些威脅殲滅他存在的敵對力量侵犯。

果戈理這第一次的出走俄國只持續了約六至七星期。他走海路到德國北部的城市盧卑克(Любек)。這趟旅程似乎是果戈理自我放逐的衝動事例之一，這突如其來的舉動，或許是因《漢斯·古謝加頓》不被接受，果戈理難以承受這個事實，這趟國外之行也再度被普特尼理解為是果戈理嘗試重建被《漢斯·古謝加頓》的完全失敗所嚴重侵犯的珍貴安全區域。

## 九、《狄康卡近鄉夜話》問世與新朋友

在 1831 年夏天狄康卡故事的第一部出版，隔年三月第二部又問世，它的出版在彼得堡文學界造成轟動也自然擴展了果戈理的交遊。故事集第一部問世後不到一個月，果戈理得以和另一位烏克蘭同胞馬克西莫維奇(М. А. Максимович)結識，他是一位民族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對烏克蘭民間口頭創作的研究，對果戈理增修仍在進行中的烏克蘭故事多所助益。而果戈理和他長久以來所崇拜的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認識，則是在普列特尼約夫(П. А. Плетнёв)家的晚會上，大約是在 1831 年 5 月下旬<sup>117</sup>，他對於能和普希金建立友誼感到非常自豪，果戈理一直將普希金視為他寫作的導師，而他也只服膺這位天才作家，不時向其請益或是請求提供寫作題材。

1832 年夏天，果戈理離開聖彼得堡回到烏克蘭家中。途中在莫斯科停留十天時，認識了三個往後和他相當親近的朋友：波戈金(М. П. Погодин)、

---

<sup>116</sup> 維·魏列薩耶夫著，周啓超、吳曉都譯，《生活中的果戈理》，頁 36。

<sup>117</sup> 同上，頁 49。



阿克薩科夫(С. Т. Аксаков)和謝普金(М. С. Щепкин)。波戈金是小說家和莫斯科大學歷史教授，他主持雜誌《莫斯科通報》(«Моск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1827-1830)和《莫斯科人》(«Москвитянин»)(1841-1856)，對中世紀俄國歷史深感興趣，也收集許多中世紀的古老手稿和工藝品。而莫斯科作家阿克薩科夫是出身知識份子家庭的顯貴，其子康士坦丁和伊凡更成爲「親斯拉夫主義」<sup>118</sup>最重要的提倡人。謝普金是莫斯科舞台上最偉大的喜劇演員之一，1836年他在《欽差大臣》(«Ревизор»)中有相當出色的演出。<sup>119</sup>

在果戈理與友人的通信中經常可以找到暗指魔鬼涉入的意象和語言，其出現頻率之高似乎表明了果戈理對「不潔之力」具入侵日常生活能力的堅持信仰。<sup>120</sup>例如，在1833年5月8日寫給波戈金的信中提到，他們之間的兩封通信顯然是遺失了，果戈理說道：「想不出，我們的信撞上哪家魔鬼了。」<sup>121</sup>果戈理相當自然地將一些日常生活的不順遂歸咎於魔鬼的鬼把戲，因而日常通信中魔鬼不時地被提及，其實這點也清楚地體現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不潔之力」與狄康卡的居民們顯然是生活在一起，宛若狄康卡的「另類村民」。

## 十、結語

英國文豪王爾德(Oscar Wilde, 1856-1900)曾經說過：「大作家的生活往往非常乏味；他們把精力都用在寫書上了，一點也沒有留給生活。小作家的生活卻有趣得多。」<sup>122</sup>曾經搜集果戈理同時代人的回憶、評論而出版了《生活中的果戈理》一書的魏列薩耶夫(В. В. Вересаев)便對果戈理的傳記做出這樣的評論：「在乏味的作家傳記當中，果戈理的傳記又加倍地乏味和沈悶。把它仔細讀一遍，一點值得回味的東西都沒有。… 他像一個蒼白孱

---

<sup>118</sup> 親斯拉夫主義(славянофил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俄國思想界的一個支派，此派思想家受了西方思想衝擊之後，乃轉而尋找俄國自己的文化傳統，著名思想家有基列耶夫斯基(И. В. Киреевский, 1806-1856)、康士坦丁·阿克薩科夫(К. С. Аксаков, 1817-1860)、霍米亞科夫(А. С. Хомяков, 1804-1860)、伊凡·阿克薩科夫(И. С. Аксаков, 1823-1886)等。

<sup>119</sup> Christopher Putney, Russian Devils and Diabolic Conditionality in Nikolai Gogol's Evenings on a Farm near Dikanka, p. 107.

<sup>120</sup> Ibid, p. 108.

<sup>121</sup> 果戈理著，李毓榛譯，《果戈理書信集》，頁89。

<sup>122</sup> 魏列薩耶夫著，藍英年譯，《果戈理是怎樣寫作的》，頁1。

弱的幽靈似的度過了自己的一生。沒有做過任何社會探索，即便在青少年時期也不曾有過一點越軌的行爲，不曾有過一絲一毫的激情，甚至對女人最平凡的愛情也不曾有過；有的只是對生活的厭惡和隔膜，以及離它越遠越好的孤傲性情… 用果戈理本人的話來說，就是完全“平淡無奇”。<sup>123</sup> 這樣的看法道出多數人在閱讀果戈理傳記之後的感想，大體而言，傳記中的果戈理一點一點地考驗著讀者對他存有的敬意，與一般讀者期待在「巨擘」傳記中看到的偉大形象大相逕庭。閱讀果戈理傳記的同時，彷彿也在一層層地揭去作家掩飾的面具，直到看到作家「真面目」的那一剎那，是那樣的令人悵然，畢竟以揭發人性惡習爲職志的作家，其本人竟也有著如同他筆下人物般陰鬱、令人感到戰慄的負面性格。就心理學的角度而言，果戈理的氣質是屬於抑鬱質的特徵<sup>124</sup>，這樣的人多愁善感、陰鬱柔弱，十分符合傳記中所呈現出來的作家形象。

果戈理筆下的主角們，一個個儼然就是作家本身性格的折射：果戈理在處理自己私務時，正像《死靈魂》裡的齊齊科夫(Чичиков)那樣不擇手段，吹牛像《欽差大臣》裡的赫列斯塔科夫(Хлестаков)那樣忘乎所以，漫天撒謊同《死靈魂》的諾茲德廖夫(Ноздрёв)如出一轍，構築空中樓閣時的那份天真勁兒，活脫脫就是瑪尼洛夫(Манилов)。<sup>125</sup> 果戈理可說是將自己個性的黑暗面一股腦兒地赤裸呈現在讀者面前，這或許是果戈理獨特的一種告解方式，無非是想藉大眾對書中人物指摘、唾棄、批判與嘲笑的同時，也洗滌自己的罪惡與鄙陋，而這醜陋的一面，其實也就是果戈理他個人的魔鬼。

前面回顧了果戈理與縈繞其思想中的魔鬼事件，時間從童年跨越至《狄康卡近鄉夜話》出版前後，不難發現，果戈理對於魔鬼（或者說是對惡）的感受在很早就已形成，這魔鬼包含了性格中的一切負面成分：矯揉造作、城府、謊言、孤芳自賞、自負以及對女性的認知，都多少和魔鬼有所牽扯，由於他細膩的情感特質，使得他對魔鬼（惡）的感受特別敏銳，也造就他極度自我保護的心態，和魔鬼戰鬥並阻擋他入侵自己的安全區

---

<sup>123</sup> 魏列薩耶夫著，藍英年譯，《果戈理是怎樣寫作的》，頁 1。

<sup>124</sup> 馮廣國等主編，《心理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頁 177。

<sup>125</sup> 魏列薩耶夫著，藍英年譯，《果戈理是怎樣寫作的》，頁 1-2。

域，更是成爲他生活、創作的中心思想。

## 貳、果戈理與狂歡化

狂歡節（карнавал，音譯「嘉年華」）本身指源於中世紀歐洲的民間節日宴會和遊行表演，這種熱鬧非凡的節日形式，在歐洲和南美洲國家，至今仍十分盛行。在狂歡節的風格中，蘇聯學者巴赫金（М. М. Бахтин，1895-1975）提出其重要的狂歡化（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я）文化理論。1941年巴赫金在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院的博士論文《拉伯雷和他的世界》（«Rabelais and His World»）中，盡情謳歌民間文化的自由和反叛精神，從社會政治、文化審美、語言形式各個層面，闡述了狂歡節與狂歡化理論。<sup>126</sup>巴赫金溯源西方文化內部的他者聲音，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的民間文化狂歡節中，找到了反叛與顛覆的強音。這是一個歌頌肉體感官慾望的反文化和大眾文化之聲，以對抗官方文化、神學和古典文化。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縱情歡歌、開懷暢飲的真正平民大眾的節日。狂歡節是自發自願、人人參與，人人是導演、是演員、是觀眾的喜劇盛宴。作爲文化離心、多元、反叛的代表，狂歡節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對文化發展的影響深遠。<sup>127</sup>

「狂歡化」是巴赫金在《杜斯妥也夫斯基詩學問題》（«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一書中討論較多的概念，指的是「藝術形象的語言，也就是說轉爲文學的語言。狂歡節轉爲文學的語言，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狂歡化」。<sup>128</sup>亦即把節慶的種種慶賀、儀禮、形式移植到文學上的應用。巴赫金所揭示的主要是文藝復興時代，拉伯雷筆下的狂歡化形象。同樣地，狂歡化的理論也可以應用在果戈理的作品中，《狄康卡近鄉夜話》相較於果戈理的其他作品，更能令人感受到其中蘊含的狂歡化成分。

巴赫金指出通常「快樂的地方」（весёлое место）<sup>129</sup>和「快樂的時間」（весёлое время）<sup>130</sup>是狂歡元素（карнавальное начало）實現的條件。<sup>131</sup>我們

<sup>126</sup> 劉康，《對話的喧囂：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頁 262。

<sup>127</sup> 同上，頁 262。

<sup>128</sup> 同上，頁 265。

<sup>129</sup> 像是城裡或市集的廣場。

<sup>130</sup> 一年四季交替的時間、收成或是其他節慶的時間。

不難發現《狄康卡近鄉夜話》對這規律性的證實，巴赫金在《拉伯雷與果戈理：論語言藝術與民間的笑文化》（«Рабле и Гоголь: искусство слова и народная смеховая культура»）一文中，提到《狄康卡近鄉夜話》中的多個故事，都是用果戈理十分熟悉的烏克蘭民間節慶生活和市集生活組織起來的，如《索羅慶采市集》、《五月之夜》、《聖誕節前夜》、《伊凡·庫巴拉節前夜》。節日本身的題材、悠閒快樂的節慶氣氛，決定了這些故事的情節（сюжет）、形象（образы）和語調（тон）。節日、相關的各種迷信、特殊的自在快樂氣氛，使生活脫離常軌，使不可能變為可能，包括實現過去不可能的婚姻。<sup>132</sup>無論是市集或節日，本就不屬於常態生活，是跳脫日常作息的時刻，果戈理在故事時間點的選擇上，已帶有狂歡節的意味。

此外，狂歡節演出的基本舞台，是廣場和鄰近的街道。<sup>133</sup>不過，中心的場地只能是廣場，因為狂歡節就其意義來說是全民性的，無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加入親暱的交際。廣場是全民性的象徵。狂歡廣場，即狂歡演出的廣場，增添了一種象徵的意味。<sup>134</sup>其他的活動場所，只要能成為形形色色人們相聚和交際的地方，例如大街、小酒館、道路、澡堂、船上甲板等等，都會增添一種狂歡廣場的意味。<sup>135</sup>而在出現貿易市集的日子裡，在收穫葡萄的節日中，在演出宗教警世劇、宗教神秘劇、諷刺鬧劇等日子時，籠罩一切的氣氛是狂歡節的氣氛。<sup>136</sup>這一切都說明了果戈理為其故事的發生地點，選擇了最具狂歡性質的場所，頻繁出現的市集、大街、酒館這些場所，都符合狂歡發生的開放空間與人群聚集的要求。針對開放空間的概念，馬爾金在其《果戈理早期創作的多神教世界觀》（«Языческий космос в раннем творчестве Гоголя»）一文中指出，果戈理在《夜話》中從未曾將注意力轉向「下層」多神教神話中一個相當普遍的角色一家神（домовой），這和作者無限寬廣的時空思維特性有關，作者欲傳達出歐亞生活空間一居住環境之無限的目的。因此在果戈理的作品裡沒有房子的概念，有的是茅屋（хата）、庭院（двор）、露天的小酒館、自由的出入口，由於

---

<sup>131</sup> Ю. В. Манн, Поэтика Гоголя. Вариации к теме, с. 20.

<sup>132</sup> 巴赫金，《拉伯雷與果戈理——論語言藝術與民間的笑文化》，收錄於《文本·對話與人文》，頁 7。

<sup>133</sup> 巴赫金，《詩學與訪談》，頁 168。

<sup>134</sup> 同上，頁 169。

<sup>135</sup> 同上。

<sup>136</sup> 同上，頁 170。

各種人可能在此居住或經過。即使有房屋出現，果戈理也以完全開放給世界和人的原則來建構其住房。既然果戈理小說的主要情節並非在屋子裡進行，而是在市集廣場、在街道上、在田野裡，屬於封閉和定居世界的保護者一家神，自然不會在這樣的開放空間裡出現。<sup>137</sup>這再度證明果戈理空間思維的無限寬廣性是符合狂歡節特性的，至此我們可以確定《狄康卡近鄉夜話》的時間、空間安排都符合狂歡元素實現的條件。

在果戈理寫給友人敘述其親歷的狂歡節慶典的信件中，可看出他對於狂歡節的場景、細節、特點的熟稔。果戈理於 1838 年 2 月 2 日從羅馬寫信告訴丹尼列夫斯基(А. С. Данилевский)：「現在是嘉年華的時刻：羅馬在盡情地狂歡。嘉年華在義大利是種令人驚訝的現象，而特別是在羅馬，所有的人都到街上，戴著面具。若是誰無法盛裝出席，就立刻將皮襖翻過來穿或者在臉上塗上煙黑。整座森林和花圃都來到了街上，經常拖著整車的樹葉和花瓣，車輪飾以樹葉和樹枝，製造了驚人的效果，而在板車上坐了一車隊完全按古希臘穀神席瑞絲(Церера)節慶時的品味穿著打扮，或是羅伯特(Роберт)所描寫的那幅景象的品味之人。在科爾索大街(Корсо)用麵粉製造出雪景，我有聽過紙彩屑(конфетти)，但從來沒想過它是這麼的棒。試想，你能夠將一整袋的麵粉傾倒在最美麗的姑娘身上，即使這是博爾格濟(Боргези)，她也不會生氣，而是回報你同樣一袋麵粉。僕人、馬車夫都穿著化妝舞會的服裝。在其他的方面，只有普通老百姓會大吃大喝並化裝，在這裡所有都混雜在一起了。非凡的自由… 能夠隨心所欲地談天和堅決地送任何人花。甚至能夠爬上四輪馬車坐在他們中間… 對於愛情而言，是再幸福也不過的時間了。在我身上就發生了許多最羅曼蒂克的故事…」<sup>138</sup>曼恩(Ю. В. Манн)認為在這封信中果戈理記錄下了嘉年華變裝的中心時刻—藉助面具、翻面的皮襖或只是抹上煙黑來改變外表。變裝就是服裝和自己社會形象的翻新，它傳達出那樣的地形學動態，巴赫金稱之為「高至低」的換位。其實，這種交換身份、改變階級或打破等級的狂歡特色，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層出不窮。我們可以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看到村長及其他人被套在袋子裡、鐵匠在女皇宮內、父親和兒子有追求女人的平

<sup>137</sup> П. Ф. Маркин, “Языческий космос в раннем творчестве Гоголя”, Культура и текст: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часть 1, с. 111.

<sup>138</sup> Ю. В. Манн, Поэтика Гоголя. Вариации к теме, с. 9-10.

等權利、不匹配的婚姻等，打破等級的展現。<sup>139</sup>

狂歡節具有大眾文化的鮮明特徵，是在公眾廣場上舉行的節日宴會，充滿了笑罵嘲諷、下里巴人、追求感官愉悅的滿足。盡情吃喝、排泄、交媾、生育的肉體形象被誇張、變形，成為狂歡節風格的「怪誕現實主義」核心。「肉體的低下部位」和「開放的孔穴」被盡情謳歌、嘲弄，消解、懸置、拉平了高雅與低俗、官與民、士與痞的一切等級差異和距離。民間文化、大眾文化成為先鋒，成為主導。民間文化的成分不是糟粕，不是渣滓，而是精華，是瑰寶。<sup>140</sup>果戈理也深刻地體認這一點，因此摒棄傳統以貴族上層文化為主的書寫，改以民間文化為基礎，創作出《狄康卡近鄉夜話》，因此故事集的底蘊本就是富含狂歡節精神的。

狂歡節是沒有舞台、不分演員和觀眾的一種遊藝。在狂歡中，所有的人都是積極的參加者，所有的人都參與狂歡戲的演出。人們不是消極地看狂歡，嚴格地說，也不是在演戲，而是生活在狂歡之中。人們過著狂歡節的生活，而狂歡節的生活，是脫離了常軌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是「翻了個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sup>141</sup>在狂歡節中狂歡成了一種生活態度，人們融入這種生活中，盡情地享受這難得的脫軌時刻。《索羅慶采市集》結尾展現了這種人人生活在狂歡之中，無演員與觀眾之分的特性，在樂師拉起弓弦後，在場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融入舞蹈當中：

整個人群便自願或不自願地形成了一個統一和諧的整體。觀眾看到這種情況，被一種異樣的、無法形容的感情緊緊抓住了。那些陰沈的臉上似乎從來沒有露出過笑容的人們，也都頓著腳，扭動起肩膀來了。…一切都手舞足蹈起來了。（頁 41）

舞蹈是群眾不可分割和匯集的表現<sup>142</sup>，因此按照曼恩的觀點，節慶歡樂的普遍性在許多舞蹈的場景中最為明顯，在《索羅慶采市集》、《伊凡·

<sup>139</sup> 巴赫金著，李兆林、夏忠憲等譯，《拉伯雷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頁 594。

<sup>140</sup> 劉康，《對話的喧囂：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頁 263。

<sup>141</sup> 巴赫金，《詩學與訪談》，頁 161。

<sup>142</sup> Ю. В. Манн, Поэтика Гоголя. Вариации к теме, с. 17.

庫巴拉節前夜》、《魔地》和《可怕的復仇》裡都有舞蹈的場景。<sup>143</sup>

狂歡節上的主要儀式，是笑謔地給狂歡國王加冕和隨後脫冕。國王加冕和脫冕儀式的基礎，是狂歡節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這個核心便是交替與變更的精神、死亡與新生的精神。<sup>144</sup>在果戈理身上，我們看到這種死亡與新生的精神，在果戈理的創作道路上，曾前前後後多次焚燬他所不滿意的作品。1845年夏天，他寫出了《死靈魂》第二部的開頭幾章，但仍感到不滿意，便將之全部燒毀。他說：「沒有死亡，便沒有復活。」一切於是又從頭開始。<sup>145</sup>

加冕和脫冕，是合二為一的雙重儀式，表現出更新交替的不可避免，同時也表現出新舊交替的創造意義；它還說明任何制度和秩序，任何權勢和地位，都具有令人發笑的相對性。加冕本身便蘊含著後來脫冕的意思，加冕從一開始就有兩重性，<sup>146</sup>作為狂歡化特性之一的兩重性，更可以在果戈理身上找到例證。果戈理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雙重性作家。普希金說：「果戈理是個快活的憂鬱者。」而別林斯基用「含淚的笑」來界定果戈理式的幽默。阿克薩科夫說：「許多沒有親身接觸過果戈理的讀者，可能會感到很奇怪。這個使全國開懷大笑的藝術家竟是一個性情最嚴肅、思想最認真的人；這個那麼一針見血、不留情面地懲罰人類卑污品格的人，竟是一個脾氣最溫和、能毫無怨恨地忍受各種攻訐和侮辱的人。」柯羅連科(В. Г. Короленко, 1853-1921)在探討果戈理的幽默藝術時也說：「果戈理像壯士歌中的英雄似的，站在兩條不同道路的交叉路口上。」<sup>147</sup>這些作家們所指的正是果戈理身上深厚的矛盾性，而這種雙重性，早在作家童年生活中就已有表現：他有時非常快活、機智，出色地扮演劇中人物，有時又憂鬱絕望，讓人猜不透。這種反覆無常的情緒狀態後來滲透進了他的藝術思維，並最終延伸到他的作品中。<sup>148</sup>而雙重情感的複雜化，果戈理亦體現在《夜話》裡，如《索羅慶采市集》中的場景，設定在市集廣場和它的周圍，但

<sup>143</sup> Н. М. Азарова, Текст. Пособие п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 века, Часть 1, с. 485.

<sup>144</sup> 巴赫金，《詩學與訪談》，頁 163。

<sup>145</sup> 趙捷，《中外文學家軼事》。台北：萬象圖書，1993，頁 6。

<sup>146</sup> 巴赫金，《詩學與訪談》，頁 163。

<sup>147</sup> 王建剛，《狂歡詩學：巴赫金文學思想研究》，頁 137。

<sup>148</sup> 同上，頁 137。

是隨後又產生了具有重要意義的複雜化。原來，陪審官「他給市集劃了這麼一塊倒楣的地方」(頁 17)，該處根據傳說，曾是魔鬼的紅袍子被剝成碎塊的地方，於是「快樂的地方」成了「倒楣的地方」(проклятое место)。<sup>149</sup>

親暱的廣場語言，滲透了狂歡體的世界感受，特別是謾罵和譏笑的語言中，就連在現代辱罵譏諷的手勢裡，也滿是狂歡式的種種象徵意味。<sup>150</sup>在《索羅慶采市集》裡這種狂歡謾罵的場景，表現在後母赫芙拉和小伙子格里茨科之間你來我往的唇槍舌戰上：

一連串精心挑選的罵人話兩點般地落在了那放蕩的年輕人頭上。吃東西噎死你這個不中用的繆夫！讓你爸爸的腦袋給瓦罐撞個稀巴爛！叫他走在冰上狠狠滑一跤，該死的不信基督的人！叫他死了到陰間去，鬼燒掉他的鬍子！（頁 13）

小伙子則回以：她說這話真不怕爛舌頭，這百年不死的老巫婆。（頁 13）

隨即又招致後母一連串不堪入耳的辱罵：

你這不信神的傢伙！先洗乾淨你的髒臉再來跟老娘說話！沒出息的小兔崽子！我沒見過你媽，可我知道她是個廢物！你爸爸也是個廢物！你姑媽也是廢物！我百年不死！你還咬著你媽的奶咂兒吃奶哩…。（頁 13）

此外還有在《聖誕節前夜》裡，教會執事的老婆與女織布匠當街對罵的景象，一句老母狗，一句惡魔，你一言，我一語，最後甚至互相吐起唾沫來。

《狄康卡近鄉夜話》裡狂歡化元素的展現，首要就是背棄特別的社會以及道德和倫理的規矩。這是人物所處的框架和挑選出的時間配置相符，如市集、五月夜的散步遊玩或聖誕節前夜的娛樂狂歡，在這些時候人們之

<sup>149</sup> Ю. В. Манн, Поэтика Гоголя. Вариации к теме, с. 20.

<sup>150</sup> 巴赫金，《詩學與訪談》，頁 171。



間習以爲常的關係廢除了，產生了新的關係世界，即背棄社會和道德規範的世界。<sup>151</sup>即在狂歡節活動的時刻，人們之間的關係建立起一種新制度，彼此產生了特別的關係，而這種關係的出發點是建立在背棄社會、倫理、道德的規則和規範上。

在《五月之夜》裡，小伙子們發狂似地胡鬧、惡作劇，展現出他們「天知道是怎麼樣好搗亂的人」的形象。列夫科原先已打算讓這群同伴們安靜下來，但當他知道父親向甘娜獻殷勤時，再度召喚同伴一起惡作劇：

等著瞧吧，老傢伙，我要叫你知道，在年輕姑娘窗前晃蕩來晃蕩去，把別人的心上人兒搶走，會有什麼下場！（頁 75）

兒子的不敬當下放大爲對權力的不敬，因爲列夫科的父親是村長，更甚的是伴隨著所有這些是嘉年華的換裝，將皮襖反穿，以及公開的罵人和訕笑。<sup>152</sup>

「還有一件事，你們每人隨便找件什麼衣服化裝一下！」（頁 76）列夫科特別提醒自己的同伴們，爲即將展開的一場嬉鬧做好「換裝」準備，接著一群人公然跑到村長家門外，唱起自編的辱罵村長的歌曲，在這年輕人的鬧劇中，階級之分的概念在此完全消融，下對上公然挑釁、反抗。

背棄規矩的情境還可以從醉醺醺不服從命令的卡列尼克(Каленик)身上看出：

什麼村長、村長，有什麼了不起的。我也是我自己一個人兒的村長。（頁 70）

然後是一連串對村長的謾罵：

我可是一點也瞧不起村長，讓魔鬼剝光他祖宗十八代的皮，他以

---

<sup>151</sup> Ю. В. Манн, Поэтика Гоголя. Вариации к теме, с. 12-13.

<sup>152</sup> Там же, с. 13.

為他是個村長，就有權在大冷天用冷水澆人家一身，簡直是目中無人了。(頁 70)<sup>153</sup>

藉著酒意宣洩平時對村長的不滿，卡列尼克展現出對蠻橫權力的唾棄與藐視。

同樣地，在《聖誕節前夜》裡也有這種打破階級的描寫，所有有頭有臉的人都一個個從莎蘿哈(Солоха)的座上賓變成了袋中物。可是她很會迷惑人，去勾引一些最老成持重的哥薩克。(頁 127)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魔鬼之外，莎蘿哈勾引的人，從村長、教會執事、哥薩克楚布(Чуб)和斯維爾貝古茲(Свербыгуз)，可都是村裡有頭有臉的人物，可是這些人在果戈理筆下，卻都落到被裝進袋子裡的下場，而這些麻袋先是被鐵匠誤認為煤袋，而後又被奧克薩娜及其同伴們當作是裝唱聖誕祝歌時，獲得禮物的麻袋，一個女伴認為裡頭一定裝滿公綿羊、臘腸和麵包：他在每只麻袋裡足足裝了小半只公綿羊肉，裡面一定還有好多好多臘腸和麵包。(頁 147) 隨後落到教父老婆手裡的麻袋，又被誤認為裝了一隻大肥豬：噢，麻袋裡面裝著一口大肥豬哩！(頁 151) 這裡所呈現的不僅是「高至低」的換位，不光是國王和小丑這種身份懸殊的易位，甚至是將人「物化」、「畜生化」。

在整部故事集裡的神話世界當中，鬼怪的嬉戲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類鬼事就其性質、情調、功能來說，與狂歡節上的地獄形象、與 дьяблерий 有著深刻的相似。吃喝和性生活在這些故事裡，具有節慶的、謝肉節狂歡的性質。還需強調種種換裝、欺騙，以至毆打、脫冕等所起的巨大作用。<sup>154</sup> 這種狂歡節的地獄形象在《失落的國書》一篇得到最佳的體現，爺爺所深入的魔窟，既像巫魔的聚會—巫魔會(шабаш)，又像地獄的場景，在從科諾托普(Конотоп)到巴圖林(Батурин)距離那麼長的桌子上，擺的盡是佳餚美饌，桌子的長度再度說明屬於開放空間的無限寬廣，妖魔在此飲宴、交歡，長著狗臉和德國式細腿的魔鬼，搖著尾巴死死地纏住女巫，甚至威脅爺爺加入他們狂歡的活動—玩「傻瓜」的紙牌遊戲，酒池肉林，十足就是

<sup>153</sup> Ю. В. Манн, Поэтика Гоголя. Вариации к теме, с. 13.

<sup>154</sup> 巴赫金，《拉伯雷與果戈理—論語言藝術與民間的笑文化》，收錄於《文本·對話與人文》，頁 7。

一種狂歡節的形象。

果戈理正是採取「狂歡節」的處世態度來描寫不潔之力，也就是將他們從異度空間貶低至日常生活，雖然故事的主角們對於不潔之力有時也感到些許害怕，但有時也會嘲笑不潔之力：<sup>155</sup>

我的天啊！爺爺驚嘆一聲，往四下裡一瞧，都是些什麼樣的妖魔鬼怪啊！… 任何一個基督徒看了都要發抖的。儘管爺爺心裡也害怕…（頁 105）

縱然害怕，但爺爺也嘲笑魔鬼對於女巫的求愛方式，就像年輕人纏住美麗的姑娘似的那般糾纏：

可是他看到，那些長著狗臉和德國式細腿的魔鬼，是如何搖著尾巴，死死地纏住那些女巫，就像年輕人纏住美麗的姑娘們似的。（頁 105）

藝術思維的狂歡化與民間笑謔文化的薰陶是分不開的。狂歡化文學的作者幾乎都是民間笑謔文化的愛好者，果戈理就是一個例子。<sup>156</sup>因此提到「狂歡節」，就無法迴避關於果戈理「笑」的本質這最重要的問題。狂歡節的笑結合了歡樂(веселье)和嘲笑(высмеивание)，而正是這種不尋常的結合，組成了果戈理作品中喜劇的本質，也因此產生了他是諷刺家或幽默家的爭論。<sup>157</sup>果戈理的諷刺藝術深植於民間笑謔諸體裁，民間笑謔已滲透到他的語言之中。他的語言是一種特殊的親暱化的語言。借助這種語言，如姿態、手勢、表情、詞語等，他創造了一種親暱戲謔的語體風格。愛撫、謾罵、打情罵俏、自我吹捧、嘲弄或調侃，在他的作品裡處處可見。譬如，《狄康卡近鄉夜話》的前言，就是用一種與讀者非常親暱調侃的語氣呈現；講述者養蜂人魯迪·潘科自謙的口吻中，時時透露出一種見多識廣的優越感，他的話充滿了自嘲和笑謔。<sup>158</sup>

<sup>155</sup> Н. М. Азарова, Текст. Пособие п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 века, часть 1, с. 485.

<sup>156</sup> 王建剛，《狂歡詩學：巴赫金文學思想研究》，頁 137。

<sup>157</sup> Н. М. Азарова, Текст. Пособие п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 века, часть 1, с. 485.

<sup>158</sup> 王建剛，《狂歡詩學：巴赫金文學思想研究》，頁 147-148。

按照曼恩的闡釋，即使是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佔有絕大比例的情愛刻畫，也是一種狂歡化藝術的手法。果戈理通常在市集或是節日前和節日夜的活動中，編入愛情的情節。有時，至少在《索羅慶采市集》中，這種愛情情節很接近戀人歡樂把戲的故事。戀人的歡樂把戲、附帶克服由父母親、競爭對手在戀人路上設下的不同陰謀的傳統等，在結局時戀人的必然勝利，這個傳統深入到遠古、受到狂歡化的藝術成分，包括在藝術喜劇裡。從狂歡節時刻的觀點來看，《夜話》中三篇故事以戀人的結合、訂婚或是（就像在《聖誕節前夜》裡）新家庭生活的開始結束也是很重要的。畢竟婚禮是生活持續的標明、生活的新階段，永久流動且永不停歇的公共河流的樞紐。<sup>159</sup>

針對果戈理作品中的狂歡化，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首先，果戈理本身就具備狂歡節式的雙重矛盾性格，而整部《夜話》作品更是充分展示了狂歡節中的高低易位、喧鬧、毆打、辱罵、飲酒、換裝等等特質，無論在故事情節的時、地設定上或是情節表現手法上，都佐證了「狂歡化」的特性。

## 第二節 《狄康卡近鄉夜話》評介

《狄康卡近鄉夜話》（«Вечера на хуторе близ Диканьки»）是果戈理的中篇故事集，副標題為「養蜂人魯迪·潘科出版的故事集」（Повести, изданные пасичником Рудым Паньком）。《狄康卡近鄉夜話》共分為兩部，第一部（Часть первая）於1831年9月初於彼得堡問世；第二部（Часть вторая）在翌年3月初出版；並於1836年時再版。

第一部收錄了下列四篇小說：

1. 《索羅慶采市集》（«Сорочинская ярмарка»）
2. 《伊凡·庫巴拉節前夜》（«Вечер накануне Ивана Купала»）
3. 《五月之夜或女落水鬼》<sup>160</sup>（«Майская ночь, или Утопленница»）
4. 《失落的國書》（«Пропавшая грамота»）

<sup>159</sup> Ю. В. Манн, Поэтика Гоголя. Вариации к теме, с. 13-14.

<sup>160</sup> 以下簡稱《五月之夜》。

第二部則收錄以下四篇小說：

1. 《聖誕節前夜》(«Ночь перед рождеством»)
2. 《可怕的復仇》(«Страшная месть»)
3. 《伊凡·費多羅維奇·希邦卡和他的姨媽》(«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Шпонька и его тётушка»)
4. 《魔地》(«Заколдованное место»)

果戈理運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俄國文學中普遍使用的「匯集化」(циклизация)原則，使每一篇小說的開頭各有一篇序言(предисловие)。此外，小說的地點統一，都是發生在狄康卡和其鄰近地區；敘述者統一，都是狄康卡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出版者的統一，由養蜂人魯迪·潘科所出版。果戈理則隱身在平民出版者的文學面具之下，為自己突兀地踏入文學的上流世界而發窘。<sup>161</sup>

各篇作品的順序安置，確有規律可循，各部開頭都有一篇由魯迪·潘科所寫的序言，以口語化的談天方式和讀者對話，隨後附上一個簡要的詞匯表，因為擔憂一些烏克蘭用語可能是大家所不熟悉的。兩部的第一篇故事，都是充滿歡愉之情的篇章，基本上是美好的結局；其次是兩篇哥德式氛圍的小說<sup>162</sup>，最後兩篇故事都是由教堂執事所講述，以其爺爺為主角的故事，也都關於爺爺如何和不潔之力鬥爭。

在故事的時間安排方面，果戈理採事件並置，年代混淆的做法。其中《索羅慶采市集》、《伊凡·費多羅維奇·希邦卡和他的姨媽》的時間設在十九世紀，《五月之夜》、《失落的國書》、《聖誕節前夜》、《魔地》設在十八

---

<sup>161</sup> Б. С. Бугров, М. М. Голубков сост. и науч. ред.,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IX-XX веков*, т. 1, с. 177.

<sup>162</sup> 哥德小說(Gothic novel)，另譯哥特小說，通常以古堡、廢墟或者荒野為背景，故事往往發生在過去，特別是中世紀；故事情節恐怖刺激，充斥著兇殺、暴力、復仇、強姦、亂倫，甚至常有鬼怪精靈或其他超自然現象出現；小說氣氛陰森、神秘、恐怖，充滿懸念。作為一種小說體裁，哥德小說產生於 1764 年，賀拉斯·瓦爾浦爾(Horace Walpole)出版了著名小說《奧特朗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出人意料地成功，不到四個月就出第二版，在這一版上，瓦爾浦爾為書名加上副標題「一個哥德故事」(A Gothic Story)，這種小說因此而被命名為哥德小說。

詳見：肖明翰，《英美文學中的哥特小說》，

<http://www.booker.com.cn/big5/paper18/27/class001800001/hwz170164.htm>。

世紀，最後《伊凡·庫巴拉節前夜》和《可怕的復仇》則在十七世紀。<sup>163</sup> 透過場景時間的設置，可以發現年代愈是久遠，神話色彩愈形濃厚。事件安排在十九世紀（果戈理時代）的兩篇故事當中，神話色彩最爲薄弱：《索羅慶采市集》裡關於紅袍子魔鬼的傳說作爲市井流言傳播著，也是鋪陳茨岡人詭計得逞的一個手法；而神話色彩在《伊凡·費多羅維奇·希邦卡和他的姨媽》裡，更是銷聲匿跡，此篇標誌著作家的文學創作手法逐漸從浪漫主義走向寫實主義。而時序往前推移一個世紀，神話色彩也隨之漸次加深，各種神話角色活躍其內，而場景設在十七世紀的兩篇故事《伊凡·庫巴拉節前夜》和《可怕的復仇》，神話角色在此達到狂妄肆虐的頂點，爲故事注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氛圍，這也是唯一發生流血事件的兩篇故事。古今交錯、虛實交雜，是《狄康卡近鄉夜話》給予讀者的整體背景印象。

## 壹、故事梗概

### 一、索羅慶采市集(Сорочинская ярмарка)

在索洛比·契列維克(Солопий Черевик)一家人趕往索羅慶采市集的路上，他的十八歲女兒帕拉斯卡(Параска)是頭一回參加趕集，沿途她的美麗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年輕小伙子格里茨科(Грицько)與帕拉斯卡兩人一見傾心，聰明的格里茨科略施小聰明討好索洛比答應他們的婚事，可是邪惡的後母赫芙拉(Хивря; Хавронья Никифорович)卻多加阻撓，軟弱的索洛比因而反悔。此時市集裡盛傳著紅袍子的鬼故事，造成人心惶惶。有一茨岡人答應幫助格里茨科使索洛比應允這件婚事，條件是要格里茨科降價出售其小公牛。藉著這紅袍子的傳說，茨岡人先作弄索洛比一番，然後格里茨科再現身解救索洛比，索洛比這次終於下定決心，不顧赫芙拉的反對，將女兒嫁給這個好青年。

---

<sup>163</sup> Б. С. Бугров, М. М. Голубков сост. и науч. ред.,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IX-XX веков, т. 1, с. 177.

## 二、伊凡·庫巴拉節前夜(Вечер накануне Ивана Купала)

這是教堂執事福馬·格里戈里耶維奇(Фома Григорьевич)講述從他那位說故事能手的爺爺那兒聽來的故事。多少年以前，在他爺爺居住的小村落裡，那是一個最貧窮的小村落，時常出現一個幻化成人形的魔鬼巴薩夫柳克(Басаврюк)，在爺爺的嫡親姑媽開的小酒館裡縱酒作樂，村裡有位叫柯爾日(Корж)的哥薩克，家裡雇了一位舉目無親的長工彼特羅(Петро)(暱稱彼特魯西 Петрусь)。柯爾日有位美麗的女兒碧多爾卡(Пидорка)，她和彼特羅同住一屋簷下，自然而然地談起戀愛。在魔鬼的指使下，兩人的戀情被柯爾日發現，他憤怒地將彼特羅趕了出去，而欲將其女兒嫁給一位富有的波蘭人，碧多爾卡請求其六歲的小弟弟伊瓦西(Ивась)把這消息告知彼特羅，失意的彼特羅來到福馬的太姑媽開的酒館喝酒，人形魔鬼巴薩夫柳克以金錢誘惑彼特羅聽命行事，要其在伊凡·庫巴拉節前夕到熊谷(Медвежий овраг)摘取一年只在此時開花的蕨類植物(папоротник)，而魔鬼的同黨，也就是住在谷裡的女巫，更以不流血是挖不到金幣為由，促使彼特羅殺死碧爾多卡年幼的弟弟，彼特羅發瘋似地殺了伊瓦西，憑藉著和魔鬼打交道得到的兩袋金幣，他和碧多爾卡結了婚，碧多爾卡告訴彼特羅其弟被一茨岡人拐走，但彼特羅就像失憶般地，連伊瓦西的容貌都記不起來。兩人婚後過不到一個月的幸福生活，彼特羅整個人就變了樣，鎮日若有所思，試圖憶起在熊谷所發生的事，但就是想不起來，碧多爾卡請了不少巫醫來為其醫治都無效。翌年，又到了伊凡·庫巴拉節前夕，有人勸碧多爾卡去熊谷請一位能治世上所有疑難雜症的女巫來為其丈夫醫治，彼特羅在見到女巫時憶起了一切，隨後他也被魔鬼帶走，只遺留下一堆灰燼；碧多爾卡傷心地追隨彼特羅被帶走的方向而去，而此後村裡的人再也沒有見到碧多爾卡的身影，有位從基輔來的哥薩克說，他似乎在一間大修道院裡見到削瘦、不停祈禱著的碧多爾卡。

## 三、五月之夜或女落水鬼(Майская ночь, или Утопленница)

村長葉甫圖赫·馬科果年柯(голова Евтух Макогоненко)的兒子，年輕的哥薩克列夫科(Левко)愛上美麗的哥薩克姑娘甘娜(Ганна)(暱稱甘榴 Галю)，可是村長對他們的婚事百般阻撓，原來村長自己也喜歡上了甘娜，

村長老愛吹噓自己曾護送已故的凱薩琳女皇前往克里米亞的陳年舊事，是個剛愎自大、獨眼又好色的人。

離甘娜家不遠的池畔旁矗立著一棟荒蕪已久的房子，那兒曾有一個悲淒的故事，從前那裡住著一位百人長(сотник)<sup>164</sup>，他有一位漂亮的女兒，他太太早已去世，而後再娶了一個年輕貌美的妻子，沒想到這後母竟是女巫(ведьма)變的，屢想加害小女兒，最後甚至蠱惑她父親將其趕出去，傷心的女兒最後跳水自盡，成了女落水鬼們的首領，她想要向後母報仇，可是身為女巫的後母也自有辦法應付，她變成一名女落水鬼混在眾多的女落水鬼之中。

列夫科在無意中得知自己的父親竟如此無恥地和自己搶奪心愛的人，他便和一群哥薩克同伴們計畫好好整他父親一番，在作弄父親得逞後，忙著躲避父親與眾人的追捕，疲憊的列科夫最後來到這池畔休息，一股無法抗拒的睡意襲來，彷彿在半夢半醒間那位女落水鬼出現請求他幫忙指認出邪惡的後母，在列夫科指出邪惡的後母後，女落水鬼給了他一張可以幫助他和甘娜婚事的紙條作為回報。醒來後發現手中的確握著一張紙條的列夫科此時也被眾人找到，紙條上頭專員的上諭迫使村長不得不聽命為他們舉行婚事。

#### 四、失落的國書(Пропавшая грамота)

又是一個由教堂執事福馬·格里戈里耶維奇講述其爺爺和女巫們(ведьмы)玩紙牌遊戲「傻瓜」的故事。有一次哥薩克統帥指派其爺爺呈遞一封國書給女皇，爺爺將國書縫在帽子裡，便上路了。路上正好遇上熱鬧的市集，在那兒他和一個查波羅什人交朋友，而這位新朋友早已將靈魂賣給魔鬼，當晚就是他最後的期限，其爺爺和另一位同行的哥薩克義氣地答應要幫助這個查波羅什人，不讓魔鬼帶走他。當晚三人借住一家酒店，爺爺為了履行對同伴許下的諾言整晚警醒守夜，可終究不敵妖法，還是沉沉地睡去。翌日醒來，查波羅什人已不見蹤影，更糟的是，縫有國書的帽子

---

<sup>164</sup> сотник 有下列意思：一、古羅斯百人隊隊長。二、十六至十七世紀火槍兵百人長。三、舊俄哥薩克的百人長，相當正規軍中尉。



和他的馬匹都不翼而飛，爺爺心想這一定是魔鬼幹的好事。爲了追回失落的國書，爺爺按照酒店老闆的指示，千辛萬苦找到了妖魔鬼怪的地盤，女巫們和爺爺談條件，要求爺爺和她們玩三回合「傻瓜」，只要有一回合勝了她們便將國書還給他。想當然爾，爺爺只有連連落敗的份，到了最後一回合，爺爺暗暗將牌拿到桌下畫十字，一看原來是女巫施了妖術，爺爺在最後一回合勝出，並對女巫們畫十字威脅，才終於要回了國書，順利達成任務將國書呈交給女皇。

## 五、聖誕節前夜(Ночь перед рождеством)

伐庫拉(Вакула)除了是鐵匠外，還是一位聖像畫家，由於他在教堂右側門牆上畫了一幅末日審判、魔鬼驚慌失措四處奔逃的畫，因此得罪了魔鬼，魔鬼伺機要報復鐵匠。伐庫拉愛上村裡一個美麗卻高傲的哥薩克姑娘奧克薩娜(Оксана)，奧克薩娜提出一個要求，如果鐵匠能爲她弄到一雙女皇穿的鞋子，她便嫁給他。原本一心想作弄鐵匠的魔鬼，最後卻被鐵匠制服，並乖乖地馱著鐵匠飛往彼得堡，達成取得女皇鞋子的任務，並間接地促成一段美事。故事中穿插著鐵匠的女巫母親莎蘿哈(Солоха)爲了避免她眾多的情夫們互相撞見，而將他們一一裝入麻布袋中的幽默場景，其中也包括奧克桑娜的父親楚布(Чуб)。

## 六、可怕的復仇(Страшная месть)

哥薩克老大尉戈羅別茨(Горобець)爲兒子婚禮舉辦的喜筵上來了不少賓客，其中包括大尉的結拜兄弟達尼洛·布魯利巴什(Данило Бурульбаш)及其年輕的妻子卡捷琳娜(Катерина)和他們才滿周歲的兒子。婚禮上發生一件令人驚駭的插曲，在賓客中竟混雜著一位邪惡的巫師(колдун)，而使眾人惴惴不安。卡捷琳娜的父親二十一年來蹤影全無，在女兒出嫁且生了個兒子後才又回到她的身邊。他行徑詭異，不似一般的正教徒，也沒有一顆哥薩克的心。爲保護卡捷琳娜，達尼洛和岳父決鬥，最後在其妻子懇求下，才沒釀成人命。然而恐怖的陰謀正漸漸地向達尼洛逼近，原來卡捷琳娜的父親正是那位可怕的巫師，他想娶自己的女兒爲妻，又勾結正教的敵人波蘭人來犯，達尼洛在抵禦波蘭人的戰役中遭其岳父暗槍射殺。邪惡的

巫師隨後又加害達尼洛的小兒子，並佯裝是達尼洛的好友，他曾答應達尼洛若其死後要照顧並娶卡捷琳娜為妻，但其奸計遭卡捷琳娜識破，她欲殺巫師不成反遭殺害。為惡多端的巫師在興妖作法之時，屢屢出現一張騎士的臉令他感到驚愕。為此，他要求一位苦行僧為其墮落的靈魂祈禱，然而在遭到拒絕後，巫師竟又殺害了苦行僧。背負多條人命的巫師，最後死在飄蕩於喀爾巴阡山的幽靈騎士手上，屍首遭到深淵裡的其他死屍們咬嚼。故事最後出現了一位彈唱班杜拉琴的盲藝人，對這神秘的幽靈騎士的故事作了交代，原來該騎士生前遭受不義的對待，為了報復，他的靈魂無法進入天堂，只能徘徊在喀爾巴阡山內。

## 七、伊凡·費多羅維奇·希邦卡和他的姨媽(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Шпонька и его тётушка)

魯迪·潘科亦是輾轉由加佳奇(Гадяч)來的斯捷潘·伊凡諾維奇·庫羅奇卡(Степан Иванович Курочка)那兒得知這個故事：伊凡·費多羅維奇·希邦卡(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Шпонька)自小就是個循規蹈矩的小孩，品學兼優，但生性膽怯。從進入步兵團後，盡職的他在得了準尉官銜十一年之後，就被升為少尉。由於雙親皆逝，他的姨媽瓦西麗莎·楚普切夫西卡(Василиса Цупчевська)開始負責管理他那小小的田莊，辦事周延的姨媽將其家業經營得不錯，一日姨媽去信給伊凡以自己日漸衰老為由，希望他能退伍回來料理家務。從軍中榮退的伊凡在返家途中，碰上鄰村的一位胖子地主葛里戈里·葛里戈里耶維奇·斯托爾欽科(Григо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Сторченко)跟他攀親，並熱切地邀請伊凡返家後一定要到他那裡走走。原來他們之間還有一塊贈地的糾葛，伊凡為了詢問屬於自己贈地的事，便依姨媽要求，前往葛里戈里地主家拜訪，胖地主有個善於醃製小黃瓜的母親和兩個妹妹，黑髮的大妹和淺黃髮的小妹，伊凡對小妹瑪莉亞(Марья Григорьевна)挺有好感，因此姨媽便萌生撮合他倆的念頭，一來三十八歲的伊凡也該娶媳婦了，二來是豐富的嫁妝。姨媽好不容易製造機會讓他們兩人獨處，可生性膽怯的伊凡卻半天說不出什麼話來，好不容易開口說話，竟說了一句「夏天蒼蠅真是多呀」，這類言不及義的話。提到結婚這件事可真把主人翁伊凡給嚇壞了，不斷地作著關於「媳婦」的種種古怪惡夢…此時一個新的主意又在姨媽腦中醞釀，故事至此就以「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章分解」戛然而止。

## 八、魔地(Заколдованное место)

當教堂執事福馬·格里戈里耶維奇還只有十一歲年紀的時候，有一日他爹把三歲的小弟弟帶在身邊，趕著貨車上克里米亞去販賣菸草。留在家中的有爺爺、媽媽、他、大弟和二弟。由於爺爺在路旁種了一片瓜田，便搬到路旁的窩棚去住，也把福馬和弟弟們一起帶過去。每天都會有趕集的貨車打那兒經過，有時還會碰上老相識，和他們閒聊是最令爺爺感到快樂的事。

一日，當一群老相識趕集打那兒經過，爺爺拿出甜瓜來款待客人，在歡樂的氣氛下，爺爺的腳不自主地抖動了起來，想要在趕集的農民前露一手舞藝，他跳得再好不過了，可正要大展身手時，突然間他的腿怎麼也抬不起來，試了又試，可完全跳不了，背後竟有人笑了起來，一看那有什麼瓜田和趕集的農民，前後左右只是一片平坦的曠野，原來是狡猾的魔鬼在作怪，將爺爺弄到了這塊空地上來。定睛一看，這塊地還有點眼熟，原來一邊是神父家的鴿棚，另一邊是鄉文書家的糧倉。遠處小墳上有燭光在閃動，爺爺認定該處必藏有寶藏，可惜沒帶鐵鍬，於是便插根樹枝做記號，回家去了。

第二天，天剛一黑，便拿著鐵鍬、鐵鎬出發。怪了，明明就來到與前一天一模一樣的地方，可是看到鴿棚，卻不見糧倉，拐往糧倉那邊去，卻又沒有鴿棚，突然又下起傾盆大雨，使得爺爺不得不拔腿跑回窩棚。隔天，天黑吃過晚飯後，爺爺拿了鐵鍬要去掘南瓜，經過前天那塊使他跳不成舞的魔地，氣得拿鐵鍬往那塊地使勁敲去，一看，他又來到先前的田野，也看到他之前做記號的地方，這次帶著鐵鍬的爺爺便把握這個機會來挖寶，挖到一個鍋子，這時旁邊傳來鳥、羊、熊模仿爺爺的說話聲，黑夜裡山嶺後似乎又鑽出一張怪臉來，嚇得爺爺扔下鍋子要逃跑，可是回過頭來看，周圍一切跟先前一模一樣，魔鬼只不過要嚇唬嚇唬人罷了，爺爺便將沉甸甸的鍋子帶回家，正要炫耀自己的寶物的爺爺，這才發現鍋裡藏的哪有什麼金子，儘是一些垃圾、廢物，顯然爺爺又被魔鬼捉弄了。從那之後，爺爺告誡孫子們任何時候都不要相信魔鬼的話，他們的地被鄰近的哥薩克租去做瓜地用，收成一直好的出奇，至於那塊魔地，卻始終長不出什麼好東

西來。

## 貳、創作背景與緣由

果戈理的作品，是在俄國史上的黑暗期寫成的。十九世紀上半葉，俄國到處充斥著恐怖和反動，人民在農奴制度的重壓下輾轉呻吟，殘酷和愚昧籠罩著落後的俄國鄉村。《狄康卡近鄉夜話》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中創作的。<sup>165</sup>儘管如此，十九世紀初的俄國文學卻呈現出新的氣象，作家、讀者和評論家開始關注文學的民族性和各民族的現實生活。小說主人翁由原來的貴族、上層人物逐漸轉向普通人、下層人物，小說描寫的場面由過去單一的貴族奢華生活轉向各民族多姿多彩的生活畫面和生活習俗。<sup>166</sup>簡言之，文學中的民族性(народность)成爲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歷經浪漫主義流派高峰的俄國文學所首要關注的問題。「小俄羅斯」即「烏克蘭」的概念在那個年代幾乎等同於民族的同義詞。畢竟，歷史上以基輔爲首都的烏克蘭，是俄羅斯國家之母，由於種種因素它更完整地保存了民族習俗和風尚的明確性、民族風貌的鮮明性。<sup>167</sup>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促使果戈理將創作焦點轉向了自己的出生地烏克蘭，並從中尋求民族性的展現。

推究果戈理創作《狄康卡近鄉夜話》的緣由，可以歸納出下列三點因素：一爲迎合時尚，二爲經濟因素，三是心靈的某種需求。

果戈理進行《狄康卡近鄉夜話》的創作可謂匯集了天時、地利與人和，一來當時流行具異地風味色彩的文學，其中又以像是自己的、但又不是自己的、鄰近的且具親戚關係的烏克蘭地區文學最令人感興趣。同時，烏克蘭又是果戈理的出生地，童年、少年時期都在那裡度過，再加上家人幫忙他收集各種沒有出版過的民間資料等有利條件，使得果戈理在選擇以小俄羅斯作爲創作素材時，比別人更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然而，不可諱言，作家創作的動機之一，也是出於經濟的因素：果戈理承認，寫作出書是因

<sup>165</sup> 景文山，〈評果戈理的《狄康卡近鄉夜話》〉，《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四期，頁84。

<sup>166</sup> 余獻勤，〈從《狄康卡近鄉夜話》觀果戈理〉，《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3年，第26卷，第1期，頁99。

<sup>167</sup> Ю. В. Манн, Николай Гоголь: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с. 77.

爲他需要錢，這是改善公務員收入的一種手段。<sup>168</sup>僅憑當公務員的微薄薪水並無法支付他在首都生活的一切開銷，因此寫作掙錢成了他最務實的想法。

最後一項原因則是更重要的心靈層面因素，即他所謂「心靈的某種需求」：果戈理在《作者自白》（«Авторская исповедь»）中曾經說道：「人們在我的初期作品中看到的那種愉快，其原因在於某種精神要求。我有一種自己也無法解釋的苦悶，常常發作。這種苦悶也許是由於我的疾病產生的。爲了使自己開心，我… 想出些十分可笑的人物和性格來，想像如何把他們放置在最可笑的境遇中，完全不去考慮這樣做是爲什麼，有什麼好處以及對什麼人有好處。在青春時代心中往往不會發生任何疑問，是青春的力量慫恿著我這樣做。這便是我那些初期作品的來源，這些作品使有些人一也使得我自己一無憂無慮地歡笑，使得另一些人困惑不解：一個聰明人怎麼會出現這種蠢話呢？」<sup>169</sup>其實「某種精神要求」指的就是文藝的「淨化」功能，從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到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許多學者都以爲文藝對於情感有「淨化」(katharsis)的效驗，就是說情感不發洩對於心身都有壞影響，一經發洩，這種壞影響便被「淨化」，不復爲祟。<sup>170</sup>文藝創作是果戈理情感宣洩的出口，他也表明這是他工作之餘的休息和閒暇時間結出的果實<sup>171</sup>，因此同他創作的人物相聚在一起是他一天中最美好的時刻。文藝是一種慰情的工具，所以都帶有幾分理想化。藝術家不滿意現實世界，才想像出一種理想世界來彌補現實世界的缺陷。<sup>172</sup>這點可以解釋果戈理爲何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創造出和他當時身處的彼得堡陰暗濕冷的氣候相對比的充滿陽光燦爛、明媚風光的烏克蘭世界。

另外，在一封 1847 年 12 月 29 日寫給茹可夫斯基(В. А. Жуковский)的信中，果戈理描繪了《狄康卡近鄉夜話》的起源：「早在中學時代，我有

---

<sup>168</sup> 亨利·特羅亞著，趙惠民譯，《幽默大師果戈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頁 110。

<sup>169</sup> 程正民，《俄國作家創作心理研究》。天津：百花文藝，1999，頁 43。

<sup>170</sup> 朱光潛，《文藝心理學》。台北縣土城市：頂淵，民 92，頁 249。

<sup>171</sup> 果戈理著，李毓榛譯，《果戈理書信集》，頁 64。

<sup>172</sup> 朱光潛，《文藝心理學》。台北縣土城市：頂淵，民 92，頁 249。

時感到自己有一種快活的天性，常常以不合時宜的玩笑讓同學們討厭。但這是偶爾發生的事，一般來說，我是個性格憂鬱、喜歡沈思的人。後來這種情況又加上了疾病和憂鬱症。然而這些疾病和憂鬱症又是我早期作品中出現的那種快樂的原因：爲了娛樂自我，我毫無遠見地虛構了一些主人翁，並把他們置於可笑的境地。這就是我的中篇小說的來源！」<sup>173</sup>正是這種出於「某種心靈的需求」解釋了《狄康卡近鄉夜話》中所有鬧劇的成分。

前面在探討果戈理和其內心魔鬼時，我們已經知道他個性中陰鬱的一面，心理學上更界定他的氣質是憂鬱的，在他的作品中出現了十分歡快的《狄康卡近鄉夜話》，這種憂鬱的氣質和喜劇形式的奇妙結合，看似悖論，其實是有道理的。一般說來，不同氣質的作家會形成不同風格的作品；然而，創作的心理現象是千變萬化，異常複雜，所以個性豪邁者的作品不必然是壯烈的，沈鬱者的作品也不盡然是悲酸的。<sup>174</sup>不管作家採用什麼形式，作家的內在氣質總是要在風格迥異和情調迥異的作品中頑強表現出來，總是要影響作品的基調<sup>175</sup>，《索羅慶采市集》結尾的歡樂氣氛戛然而止，轉爲濃濃的哀愁所取代，便是作者內在氣質終究會對作品基調產生影響的一個例證。

迥異於在後來的作品中，果戈理主要通過辛辣的諷刺、透過笑來發洩心中的苦悶和憂鬱，在早期作品《狄康卡近鄉夜話》中，果戈理乃是透過歡樂浪漫的情調來宣洩心中的苦悶和憂鬱，達到其心靈某種需求獲得滿足的目的。

## 參、作品評價

於 1831 年出版的普希金《已故別爾金小說集》(«Повести покойного И. П. Белкина»)和果戈理的《狄康卡近鄉夜話》標誌著俄羅斯文學的一個新世代—散文時代的開始。關於果戈理的這本書，大致反應是良好的，人們讚揚和稱道這位年輕的作者。讚揚者說它忠於小俄羅斯的現實，辱罵者則

---

<sup>173</sup> 果戈理著，李毓榛譯，《果戈理書信集》，頁 406-407。

<sup>174</sup> 程正民，《俄國作家創作心理研究》。天津：百花文藝，1999，頁 40-41。

<sup>175</sup> 同上，頁 44。

說它缺乏這種忠實性。<sup>176</sup>

## 一、正面評價

每位作家莫不期待自己的創作能獲得廣泛閱讀大眾的喜愛與批評家的讚賞，初出茅廬的年輕作家果戈理當然也不例外。尤其在被譽為俄國文學黃金時代的十九世紀，批評家們對於作家的作品更是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要使作品為閱讀大眾接受，除了作品本身的吸引力之外，批評家的評介更是功不可沒，若是能得到大批評家或當時已享譽文壇的作家之肯定，更能使新興作家迅速獲得聲譽。

除了那首田園詩《漢斯·古謝加頓》因銷售不佳、遭受批評，果戈理買回所有餘書並燒毀外，果戈理闖蕩文壇之路還算順遂，其首次的散文嘗試—《狄康卡近鄉夜話》的出版更為他帶來成功，獲得普遍正面的評價，這部作品也為其奠定文壇聲譽。《狄康卡近鄉夜話》甫出版便以其新穎的特性而深獲大眾的喜愛。

這部作品在文學界引起的回響也不遑多讓。奧多耶夫斯基(В. Ф. Одоевский)<sup>177</sup>在 1831 年 9 月 23 日寫給科舍廖夫(А. И. Кошелёв)<sup>178</sup>的信中，第一時間回應了《狄康卡近鄉夜話》的出版：「… 近日小俄羅斯民間故事《近鄉夜話》問世。它們據說是一個叫做果戈理的年輕人所寫的，我在他身上預見了巨大的才能：你無法想像，他的小說無論在虛構、故事及體裁上都勝過那些迄今以俄國小說(под названием Русских Романов)之名出版的作品。」<sup>179</sup>

這是一段簡短卻很有洞察力的看法。奧多耶夫斯基察覺這些故事的民族特性，他謙稱這是他身為《俄國之夜》(«Русские ночи»)的作者本身所缺乏的浪漫主義，他看到了「巨大天才」的展現，評價了文體和幻想的豐富

<sup>176</sup> 伊·佐洛圖斯基著，劉倫振等譯，《果戈理傳》，頁 169。

<sup>177</sup> 1803/04?-1869，公爵、俄國作家、音樂評論家。

<sup>178</sup> 1806-1883，俄國社會活動家，斯拉夫派，地主兼企業主。

<sup>179</sup> С. И. Машинский, М. Б. Храпченко ред., «Ранний Гоголь-романтик.» Введение. Н. В. Гоголь: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семи томах, Т. 1, Вечера на хуторе близ Диканьки. А. В. Чичерин,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6, с. 307.

性。科舍廖夫在自己的信中詢問奧多耶夫斯基關於扎戈斯金(Загоскин)的小說《羅斯拉夫列夫》(«Рославлев»)<sup>180</sup>，這部小說在果戈理《狄康卡近鄉夜話》出版的同一年也引起了軒然大波。奧多耶夫斯基甚至連提都沒提這部小說，就將樸質的新小說置於高出「那些迄今以俄國小說為名出版的作品」的地位<sup>181</sup>，由此可見奧多耶夫斯基在當時是如何推崇《狄康卡近鄉夜話》這部新作。然而不僅僅是奧多耶夫斯基一人將《狄康卡近鄉夜話》置於高出其他散文作品的地位。當時著名的作家烏沙科夫(В. А. Ушаков)將自己《殘障者的休閒》(«Досуги инвалида», ч. 1, М., 1832)一書獻給「狄康卡的養蜂人魯迪·潘科」。他在前言解釋自己這決定的動機時寫道：「將小說獻給您，最敬愛的潘科，儼然是所有小俄羅斯人也幾乎是所有大俄羅斯的敘述者當中最聰穎的一位！請隨意讀讀吧。但請勿見怪。我無法像您寫得如此機智巧妙。」<sup>182</sup>

文壇和批評界兩大巨擘普希金和別林斯基更是對果戈理《狄康卡近鄉夜話》這部作品一致高度評價。普希金 1831 年寫給《俄國榮軍報》文學副刊(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прибавления к «Русскому инвалиду»)出版人沃耶伊科夫(А.Ф. Воейков)的信中如此寫道：「我剛剛讀完《狄康卡近鄉夜話》。它使我感到驚嘆。這才是真正的快樂！一種真誠的、無拘無束的、沒有矯揉造作、沒有迂腐習氣的快樂。有些地方是多麼富於詩意啊！多麼富於感情啊！在我們當代文學中，這一切是如此不同凡響，至今令我神遊忘返。有人告訴我，當出版人(果戈理)走進承印《夜話》的印刷廠時，排字工人們以手掩嘴，忍不住噗哧笑了起來。領班解釋了他們歡笑的原因，向他承認，排字工人們在給他的書排字時笑得要死。莫里哀(Мольер)和菲爾丁(Фильдинг)要是能使自己的排字工人發笑，大概也會感到高興。我祝賀公眾有了一本真正令人快樂的書，並且衷心祝賀作者今後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雜誌評論家們照自己的老習慣攻擊他語句不雅、腔調討厭等等，那麼

---

<sup>180</sup> 小說全名為《羅斯拉夫列夫，或 1812 年的俄國人》(«Рославлев, или русские в 1812 году»)，這是扎戈斯金(М. Н. Загоскин, 1789-1852)的小說，場景發生在 1812 年祖國戰爭時期，以軍官羅斯拉夫列夫和他的未婚妻波莉娜(Полина)之間關係的悲劇故事愛情情節為故事基礎。

<sup>181</sup> С. И. Машинский, М. Б. Храпченко ред., «Ранний Гоголь-романтик.» Введение. Н. В. Гоголь: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семи томах, Т. 1, Вечера на хуторе близ Диканьки. А. В. Чичерин,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6, с. 307.

<sup>182</sup> Ю. В. Манн, Николай Гоголь: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с. 80-81.



看在上帝的份上，請您站在他那邊吧！是時候了，應該用特列季亞科夫斯基(Тредьяковский)教授的侍僕的筆法，把我們文學中的 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 (可笑的、裝腔作勢的女人)，把那些喋喋不休地談論他們未曾有過的漂亮的女讀者，談論並未邀請他們光臨的上流社會的人，以及這一切嘲笑一番。」<sup>183</sup>普希金在信件中，除了稱許《狄康卡近鄉夜話》的獨特性之外，也為預設將得到的批評做了辯護，暗嘲某些雜誌評論家老是以上流社會矯揉造作的文雅為創作依歸，而敵視普羅文學粗鄙的語句，頗有先發制人的意味。

針對《狄康卡近鄉夜話》的再版，普希金於雜誌《現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1836年第一卷上發表了一篇書評：「我國讀者當然記得《近鄉夜話》問世留給他們的印象：對一個能歌善舞民族的生動描寫，小俄羅斯大自然的明媚風光，純樸而又淘氣的歡樂的場面，這一切都使大家很快活。馮維辛<sup>184</sup>(Фонвизин)時代以後我們就沒有歡笑過了，如今出了一本俄羅斯的書，它使我們得以笑顏常開，對此我們真是驚訝不已！我們非常感激這位年輕的作者，樂於原諒他文風上的不平衡、不正規，某些故事的不連貫、不逼真，而把這些不足之處交給批評家，讓他們去撈一點便宜。…」<sup>185</sup>除了以「快活」的書來形容《狄康卡近鄉夜話》外，普希金雖然認為這部作品仍有不足之處，但依舊是瑕不掩瑜。普希金的評價對果戈理的文學生涯有重要的影響，因為這是對於富創新精神的果戈理在文學起步時的有力支持。

跟普希金一樣，別林斯基立刻就明瞭《狄康卡近鄉夜話》完全確立他們深刻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的所有創新的藝術創作意義。別林斯基在對俄國讀者闡明果戈理創作的意義時扮演了決定性的地位。岡察洛夫(И. А. Гончаров)強調別林斯基的這個角色，「可以大膽地說，如果沒有批評家別林斯基，果戈理就不會在大部分人面前成為巨擘，因為別林斯基如何評論

---

<sup>183</sup> 普希金著，張鐵夫譯，《俄羅斯的夜鶯：普希金書信選》。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頁228-229。

<sup>184</sup> 馮維辛(Д. И. Фонвизин, 1744 (或 1745)-1792)，俄羅斯十八世紀古典主義的重要作家，著有《旅長》(«Бригадир»)、《紈袴少年》(«Недоросль»)等諷刺喜劇。

<sup>185</sup> 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著，馮春譯，《普希金文集：文學論文》(«Критик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頁302-303。

作家，作家立刻就在讀者面前成爲那樣的人」。<sup>186</sup>批評家所肩挑的重責大任，由此可見，他們往往能左右一部作品的成敗。

別林斯基在《論俄國中篇小說和果戈理的中篇小說》(«О русской повести и повестях г. Гоголя»)一文中提到：「果戈理以《狄康卡近鄉夜話》一書著名於世。這是小俄羅斯的詩的素描，充滿著生命和誘惑的素描。大自然所能有的一切美好的東西，平民鄉村生活所能有的一切誘人的東西，民族所能有的一切獨創典型的東西，都以彩虹一樣的顏色，閃耀在果戈理初期的詩情幻想裡面。這是年輕的、新鮮的、芬芳的、豪華的、令人陶醉的詩，像愛情之吻一樣… 你讀讀他的《五月之夜》吧！在冬夜，圍著火光熊熊的爐子讀它，你就會忘掉冬天，以及嚴寒和風雪；你將驚嘆這幸福南方充滿奇妙與神秘的、輝煌的、透明的夜；你將驚嘆這年輕蒼白的美女，兇惡繼母仇恨的犧牲物，這敞開一扇窗的空寂房屋，這荒涼的湖，月夜投照在平靜的水面，幾排影蹤縹緲的美女在綠色的岸邊舞蹈… 此情此景，宛如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在你的想像中所留下的印象。《聖誕節前夜》是民族的家庭生活、他們的小歡樂與小愁苦的一幅完整而充分的圖畫。總之，這裡包含著他們生活全部的詩。其次，《可怕的復仇》是《塔拉斯·布爾巴》的對稱物，這兩幅巨大的圖畫一致顯示出果戈理的才能可能發揚到什麼程度。可是，要叫我分析起《近鄉夜話》來，我會永遠分析不完的！」

187

別林斯基在另一篇文章《1841年的俄國文學》(«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1841 году»)裡亦寫到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具有「愉快的幽默性、擁護神的世界的年輕人的微笑。在這裡所有的事物都是明亮的，所有事物都閃耀著快樂和幸福的光芒：生活的黑暗精靈並不會以沈重的預感擾亂充滿生機跳動的年輕心靈。在此詩人彷彿自己也在欣賞由他所創造的原作。但是這些原作並不是他的臆想，它們並不是按他任性的要求而混合在一起的，詩人深深相信它們的真實性。因此每個人物在他自己日常生活、自己性格和所處環境影響下說話和行事。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說漏嘴：詩人精確地相信現實並沒有任何自命引人發笑的意圖來經常描寫一些滑稽的特

<sup>186</sup> В. В. Ермилов, Гений Гоголя, с. 68.

<sup>187</sup> 別林斯基，《文學論文選》，頁 166。

徵，只不過是順從自己的直覺、自己現實性的節奏。」<sup>188</sup>

納杰日金(Н. И. Надеждин)<sup>189</sup>在《望遠鏡》(«Телескоп»)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談到烏克蘭是「保留著斯拉夫面貌最真實特徵的極珍貴的方舟，人民的風俗習慣，由於對於故鄉的古風有一種幼兒般的依戀，暫時未受外來所影響，因而至今還保持著這種優點… 但是直到現在，任何人也還沒有像善良的養蜂人魯迪·潘科那樣，把它表現得如此準確，如此生動和如此迷人。」<sup>190</sup>

批評家之中，格里戈里耶夫(А. А. Григорьев)在《果戈理和他最近的一本書》(«Гоголь и его последняя книга», 1847)中，評價《狄康卡近鄉夜話》或許是最完整地和最接近作者構思的：「這是詩人還年輕的、新穎的靈感，如同烏克蘭天空般的明亮，在它們中一切都是開朗和快樂的，是最樸直的幽默，就像人民的幽默一般。還未聽說過那種稍後在果戈理的作品中成為唯一正直角色的惡意的笑，雖然在這首次創作中已清楚表現出詩人的才華特質，即描寫庸俗之人的所有庸俗，陳列所有瑣事的特質，因為它們是如此清晰地投射在眼前… 因此在讀者的心中就有點輕鬆，有點豁達，就像在詩人心中那般的輕鬆與豁達，還沒有從家鄉天空的魅力中走出，還滿溢著他烏克蘭稠李的芳香。也許，在古代作家之後，沒有一位作家像果戈理這般具有和大自然那樣完整、和諧的同感；沒有一個作家像他那樣具有可塑的美的成就(只要回想在他的《羅馬》中的安努齊阿塔(Аннунциата)，這是古代義大利大師的有力筆觸創作)，對所有人和所有事物圓滿的美麗。<sup>191</sup>…」格里戈里耶夫認為果戈理具有天人合一的細膩情感，這造就他在演繹自然與人的關係上達到和諧的美感。

沃隆斯基(А. К. Воронский)在1934年的《果戈理》(«Гоголь»)一書中肯定《狄康卡近鄉夜話》：「果戈理的幻想絕非外在的手法、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固有的幻想。抽離魔鬼、巫師、女巫、令人作嘔物、豬臉，小說不

<sup>188</sup> Б. В. Соколов, Гоголь.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 94 -95.

<sup>189</sup> 1804-1856, 俄國評論家、美學家。

<sup>190</sup> 納杰日金,《文學批評：美學》。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社，1972，頁281。轉引自赫拉普欽科著，劉逢祺等譯，《尼古拉·果戈理》，頁139。

<sup>191</sup> Б. В. Соколов, Гоголь.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 95-96.

僅在情節上、構思上、想法上都分崩離析。邪惡、外來的勢力不知道從哪一方出現，可能透過金幣和各種東西之助，破壞了寂靜、安逸的古老制度，這就是構思所在。在財富、金錢和寶藏之中有某些魔鬼的東西：它們召喚著、吸引著、誘惑著、促使犯下可怕的罪行，把人變成肥胖的牲畜、變成嗜食肉食者，剝掉似人的外形。東西和金錢有時顯得非常生動、活潑，而人則是變得像死的東西，像是楚布、教父、教堂執事，他們由於魔鬼的陰謀而變成了大麻袋。」<sup>192</sup>沃隆斯基除讚賞果戈理的幻想是一種創新、精心設計、不落俗套之外，他也點出果戈理善於將人「物化」，將物「人化」，這種身分倒置、反轉的手法。

## 二、負面評價

波列沃依(Н. А. Полевой) 在 1831 年第 17 期的《莫斯科電報》(«Московский телеграф»)上發表嚴厲斥責《狄康卡近鄉夜話》的文章。他對果戈理寫道：「您的整部小說極不連貫，儘管有許多鮮明描寫人民的優美細節，但是每一篇故事都不堪卒讀。那種模仿小俄羅斯詞語的願望，使您的語言和您的全部敘述混亂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有些地方不知所云。」<sup>193</sup>但隨著《狄康卡近鄉夜話》大獲成功使波列沃依事後在談論小說集第二部的文章時，對自己原先的觀點做了若干修正，先是肯定果戈理在許多地方善用鄉親們的幽默、敘事生動活潑，但話鋒急轉，依舊對《夜話》提出相當尖銳的否定意見。波列沃依指出：「您高興地讀著《聖誕節前夜》、《伊凡·費多羅維奇·希邦卡》、《魔地》，但是讀過之後，您會忘掉一切：任何一種思想，任何一個畫面，任何一句話都不能深深地印在心裡。」<sup>194</sup>暗喻著在果戈理的故事中，絲毫沒有令人印象深刻之處。顯然他也對「果氏幽默」嗤之以鼻，認為「作者不斷地運用他得心應手的武器，運用笑話，然而貫穿全書的一個又一個笑話終於令人感到厭煩。」<sup>195</sup>

由格列奇(Н. И. Греч)和布爾加林(Ф. В. Булгарин)出版的《祖國之子和

<sup>192</sup> Б. В. Соколов, Гоголь.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 96.

<sup>193</sup> 赫拉普欽科著，劉逢祺等譯，《尼古拉·果戈理》，頁 137。

<sup>194</sup> 載《莫斯科電訊》，1832 年第 6 期，第 265 頁。轉引自赫拉普欽科著，劉逢祺等譯，《尼古拉·果戈理》，頁 138。

<sup>195</sup> 同上。

北方檔案》(«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 и Северный архив»)通過察倫內伊(А. Царынный)<sup>196</sup>的文章，指出果戈理描寫烏克蘭風俗習慣中的錯誤之處：

1. 在烏克蘭，青年人不會喝得酩酊大醉。
2. 哥薩克不彈班杜拉(бандура)琴。
3. 婚禮不在市集上舉行。
4. 「茨岡… 在代表小俄羅斯誠實和敬神的居民生活風俗中，不佔有地位。」
5. 在凱薩琳一世(Екатерина I)和安娜女皇(Анна Иоанновна)統治下，烏克蘭沒有蓋特曼(гетман)<sup>197</sup>，而如果說到凱薩琳大帝(Екатерина II)時代(見小說《失落的國書》)，則那時已有郵政，根本用不著派急使送信。<sup>198</sup>

這種對果戈理作品民族學精準度的批評，已近乎吹毛求疵的地步，畢竟它只是一部文藝作品，作家也未給自己設定編寫民族風俗習慣指南的任務，他的目的不過在於反映人民的生活以及民族精神。之所以會出現這樣苛刻的批評，是因為布爾加林竭力想使果戈理屈服於自己的影響，同時貶低《狄康卡近鄉夜話》的意義和果戈理獨具一格的才能。<sup>199</sup>

同樣地，布爾加林的密友辛科夫斯基(О. И. Сенковский)雖也表面讚許果戈理這部作品，但又同時對它採取否定的態度。他是果戈理作品「鄙俗」論的第一批提出者之一，他認為果戈理的每個故事都有同樣的面孔，盡是些小俄羅斯的莊稼人、哥薩克、神職人員和工匠，《狄康卡近鄉夜話》在他看來是俗文學。<sup>200</sup>

針對察倫內伊所指出的民族學謬誤，波列沃伊的看法和他一致。他也沒放過這位「年輕的烏克蘭人」，他冷冰冰地說：「其一，他根本不是「烏

---

<sup>196</sup> 或謂斯托羅任科(А. Стороженко)。

<sup>197</sup> 古時候烏克蘭哥薩克軍隊的首領。

<sup>198</sup> 伊·佐洛圖斯基著，劉倫振等譯，《果戈理傳》，頁 170。

<sup>199</sup> 赫拉普欽科著，劉逢祺等譯，《尼古拉·果戈理》，頁 140。

<sup>200</sup> 同上，頁 140-141。

克蘭人」(хохол)，而是『喬裝打扮的莫斯卡利』<sup>201</sup>(переодетый москаль)，無論是對小俄羅斯的風俗，或是它的語言，他都一竅不通。更有甚者，他對歷史的理解也一場糊塗，雖然他在利用歷史資料（果戈理小說的情節發生在十七到十八世紀）和在掩蓋自己真實姓名方面力圖模仿司各特<sup>202</sup>(Вальтер Скотт)。「<sup>203</sup>顯然波列沃伊對於這種一味模仿司各特的手法相當不以爲然。

### 三、果戈理自己的評價

1833年2月1日果戈理寫給波戈金(М. П. Погодин)的信中，稍微評價了《狄康卡近鄉夜話》以及其他的早期作品，但表明拒絕再版：「您問到《狄康卡夜話》。見他媽的鬼！我不出版了。雖說掙到錢對我來說並不是多餘的，但是爲此而寫作，而增添故事，我不幹。我沒有做投機交易的任何才幹。我甚至忘記了我是這些夜話的作者，是您才提醒我這一點。斯米爾金(Смирдин)<sup>204</sup>第一卷印刷了150本，因爲若是沒有第一卷，則沒人買第二卷。他沒有多印，我也很高興。它們的命運就無人知曉了！暫時我是寫不出什麼有分量的、偉大的、藝術性的東西來。」<sup>205</sup>

除此之外，1842年果戈理在編輯自己的第一部文集時，在序言中對《狄康卡近鄉夜話》作了這樣的評論：「整個第一部本應完全刪除：這是不成熟的初試之作，不值得讀者屈尊一讀；但是其中卻也感覺得出靈感初萌的甜蜜時刻，於是我開始不忍心把它們刪掉，就像不忍心從記憶裡抹去那不可復得的青年時代的最初遊戲。」<sup>206</sup>

此外，根據博江斯基(О. М. Бодянский)<sup>207</sup>的見證，果戈理在死前不久，曾打算不要將《狄康卡近鄉夜話》收到作品中，因爲他在書中找到「許

---

<sup>201</sup> 莫斯卡利(москаль)是革命前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人對俄羅斯人的蔑稱。

<sup>202</sup> 1771-1832，英國著名小說家和詩人。

<sup>203</sup> 伊·佐洛圖斯基著，劉倫振等譯，《果戈理傳》，頁170-171。

<sup>204</sup> 1795-1857，書商，出版商。

<sup>205</sup> 李毓榛譯，《果戈理書信集》，頁83-84。

<sup>206</sup> 伊·佐洛圖斯基著，劉倫振等譯，《果戈理傳》，頁177。

<sup>207</sup> 1808-1877，俄國語文學家和歷史學家。

多不成熟之處」。<sup>208</sup>

綜合這些褒貶兼具的評價，不難發現對《狄康卡近鄉夜話》的正面評價多為盛讚其不凡創新之處，刻畫地方色彩生動迷人；而負面評價往往是從民族學正確的觀點出發，針對故事集中與事實不符之處進行攻訐，批判作家違背史實，或是純粹以不友善的態度來看待這部作品。而果戈理本人在後來檢視自己早期的創作時，也有感於這部作品有許多不成熟之處，認為應該完全摒棄，可是就如同作家自己所言，畢竟作品還是蘊含了靈感初萌的甜蜜時刻，要捨棄於心不忍。儘管作品確有些許不足之處，但這是青澀美感的標誌，是屬於作家最初青春歡樂的印記。

---

<sup>208</sup> Б. В. Соколов, Гоголь.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 95.